

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 24

第2卷第24期

总第35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十五五”教育怎么干？教育部部长与一线教育工作者研讨	1
亚太经合组织教育论坛举行 以教育联通促繁荣 以文明互鉴促共兴	5
G20 教育对话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举行 凝聚共识助推全球教育转型	9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发布 我国热点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一	11
第十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	13
河北省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建设研讨会在石家庄举办	13
国际动态 欧盟力推微证书以应对技能短缺 但跨域认可与整合仍面临挑战	14
国际动态 最新报告显示亚洲正在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	16
国际动态 英国发布报告呼吁重塑高等教育 迈向可持续经济与知识共享的根本性改革	17
院校动态 华南师范大学：为澳门教育腾飞“插上翅膀”	19
院校动态 东南大学以“四个聚焦”推动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20
院校动态 同济大学发布“人工智能协同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规划”	23

高教研究 24

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破局之道 刘建平	24
追求质量、经世致用、国际引领：推动高校科研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 伍宸	26
“十五五”规划编制 国家教育“十五五”规划深度解读 李星杰	29
“十五五”规划编制 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 卢伟 徐宏宇	32
“十五五”规划编制 现代化治理改革推动高校“十五五”规划落地 蒲智勇	34
服务区域发展 贴着需求走、围着产业转、瞄着实战干，重庆科技大学——做好服务区域发展“大文章” 黎德龙 赵明阶	37
服务区域发展 筑基·架桥·落地：地方高校转型须向深而行 刘德仿 宋青 洪林	39
服务区域发展 人才链对接产业链、创新力激活生产力，湖北文理学院——点燃深度服务城市强引擎 杜国锋	42
院校研究 中国院校研究的三种模式及其特征 魏署光 马玉龙	44
院校研究 院校研究中的师生参与及其制度保障 雷洪德 惠志丹 王坤	54
人工智能 当知识触手可及：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 阿尔西娅·尼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4 期
第 2 卷第 24 期·总第 35 期
2025 年 11 月 7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德·卡明斯基	63
人工智能 摘除“人工智能耻辱”的标签：论强制性 AI 披露声明的负面影响与教学转向 朱莉·麦考恩	64
人工智能 当人工智能成为课堂伙伴：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阅读与思维教育 约翰·麦克沃特	66

他山之石 68

美国顶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启示——基于 5 所大学 PPE 专业的案例分析 荀渊 廖思敏 陈璇木子	68
美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解构及启示——基于普渡大学的范例考察 杨冬 游昶	68
国外跨学科培养博士生的要素识别与模式构建——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视角 杨秀芹 常玲玲 徐叶莹	69
从科研成果到社会影响：英国 REF 的多维表现与实践启示 金童童 刘传斌 毕乐 韩红桂	69
香港地区大学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及未来构想——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视角 全守杰	70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4 期
第 2 卷第 24 期·总第 35 期
2025 年 11 月 7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

高教动态

“十五五”教育怎么干？教育部部长与一线教育工作者研讨

10月30日下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10名正在学院参训的教师和基层教育工作者组成学习小组，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专题学习研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参与了这场学习研讨。

未来5年，教育怎么干？学习小组成员将最关心、最困惑的问题一一摆出，在讨论中求解。

一场深入的学习研讨

纵观历史的时间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建议》，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处历史方位，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新的战略部署，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中，教育，如何定位？又该何为？教育工作者，迫切渴望解答。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紧锣密鼓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上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唯有第一时间学深悟透全会精神，方能更好发挥先导与支撑作用。

这是一场响应迅速的学习会。

中央宣讲团成员直接与教师和基层教育工作者面对面，搭建起“政策解读”与“基层提问”的直接桥梁，让全会精神以最快速度传递到教育一线。

这是一场深入高效的座谈会。

直接提问，悉心解答，缩短的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拉近了顶层设计与基层一线的距离。

“很接地气、很有温度。”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教育局教育一科副科长樊小雪的感言道出了学习小组成员的心声。她说：“今天，我们能当面向部长请教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时的

困惑、在推动教育改革中遇到的堵点，部长逐一解答，真是把全会精神直接送达一线教育工作者。这场兼具政策宣讲和调研双重属性的交流，让基层的真问题、好建议直达决策层面，让国家战略部署更加贴近教育实际。”

值得关注的是，10名学习小组成员来自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既有教师又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来源之广，正说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需要全方位视角。大家围绕青年科技人才成长、高校毕业生就业、职业教育改革、人口结构变化下的教育资源供给等问题深入研讨，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思路方案，让全会部署的教育任务转化为实践的施工图。

大学要培养一大批青年领军人才

学习研讨会前，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党委书记李乐飞早早到场。

这些天，他在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时一直在思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要如何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未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如何破局，让更多青年人才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会上，李乐飞第一个发言。他说起，2022年，“工业工程”被纳入教育部急需建设学科清单；近年来，院系把实验室研究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用系统工程方法支持了整个生产系统的设计和改进，支撑了装备研制能力快速提升，实现“东西南北中，奋飞歼—20”……李乐飞的自豪溢于言表。

“同时，我也想向部长请教，大学如何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如何让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李乐飞恳切地将思考已久的问题提了出来。

“你提的问题很重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键在人才。”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到“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怀进鹏从国家战略角度阐述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关系。他表示，以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目标，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要重点强化青年科技人才培养，着力构建卓越青年科技人才的自主培养体系，针对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特点，实施长周期、高强度、稳定支持；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国家创新需求紧密对接，构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更好满足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

倾听着，李乐飞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张清晰完整的系统图像”。他也坚定了目标：“面向

2035，我们要培养一大批青年领军人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重担在肩。”

职业教育要有两个“绝不能”

“林业早已不是一把锄头一棵苗，而是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林业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柯碧英在学习研讨会上第二个发言。

“每年招多少学生？就业情况怎么样？”怀进鹏询问。

“今年招900多人，今年的就业率达到98%。”柯碧英回答，她特别关注“如何发挥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联系非常紧密，必须在此进程中担当重任，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怀进鹏表示，教育部将立足“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更加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匹配行业产业企业发展需求，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交流继续深入。

持续优化办学结构、着力提升内涵质量、稳步推进职教出海、大力营造良好氛围，一项项重点工作让柯碧英备受鼓舞。

“两个‘绝不能’，我记得很清楚——职业教育绝不能脱离学生个人成长，绝不能脱离产业和经济发展。”柯碧英在笔记中着重做了记号，“特别是怀部长说，职业教育供给了现代产业70%以上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

“‘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更是大有可为。”柯碧英表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要实实在在把课堂建在产业链上。接下来，学院将进行专业设置调整，以更好响应产业和社会发展需要。

基础教育更要提高公平和质量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司洪昌是学习小组中基层教育工作者的代表。全会《建议》中，“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他尤为关注。

司洪昌表示，从“十四五”到“十五五”，基础教育各学段生源依次达峰，构成了一个长达10年的生源消长变迁的周期。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这么快速度的生源变动，也没有这么大体量的生源变动，这给“十五五”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重大现实挑战，需

要未雨绸缪做好应对。

学习研讨中，他将这些思考向部长和小组成员汇报，引起共鸣。

“伴随着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如何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已经成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怀进鹏表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从精准研判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到优化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布局，再到加强教育资源跨学段统筹调配，怀进鹏给出了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解题思路”。

“面对面交流，既鲜活又权威，特别是部长提到，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更要提高教育的公平和质量，要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我备受鼓舞。”司洪昌说，“全会《建议》与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规划，在方向上、战略上、目标上都是一致的。未来，我们要把全面贯彻落实全会《建议》部署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结合起来，更全面地理解国家政策意图，指导我们做好政策研究，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指引。”

有理想负责任的行动主义者在路上

3个问题的“石子”，激荡起思考的层层涟漪。教育发展的“答案”蕴含其中。

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张明明是学习小组组长。学习研讨后，她将学习体会认真作了梳理。“作为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我备受鼓舞的同时深感责任在肩。我将把全会精神融入教学科研育人全链条工作中，向学生讲深讲透讲活讲好。”张明明说。

要深刻把握教育的人民属性——

樊小雪说：“回去后，我将和同事们切实将学习研讨成果转化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教育强区、教育强市建设的成效，为加快建立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调配机制而奋斗，深化集团化办学，优化城乡教育布局，努力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

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战略属性——

过去5年，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潘孝楠“充分感受到教育迅速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系统”。他感到振奋：“在学科交叉融合、长周期人才培养的新背景下，我们要为学生在价值观

教育和学术训练、产业实践之间搭建桥梁，要以与国家战略需求、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前沿趋势之间的适配度作为检验标准，不断培养具有创新潜能、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青年领军人才。”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副院长罗明同样深受启发：“过去5年，高校专业与国家战略、国民经济发展对接更加紧密，人才培养模式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建立了一批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合作培养大批具有良好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西工大将继续弘扬‘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精神，培养兼具深厚爱国情怀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顶尖人才。”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年11月3日第1版）

亚太经合组织教育论坛举行 以教育联通促繁荣 以文明互鉴促共兴

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教育论坛10月3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本次论坛是亚太经合组织正式批复的重要活动之一，并适逢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重要契机。

论坛以“连接、创新、繁荣”为主题，聚焦教育如何在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科技创新、深化人文交流、服务包容发展中发挥作用。来自16个经济体的政要、官员、使节、高校领导、专家、学者出席论坛，重点围绕教育联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类福祉、文明互鉴、青年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取得丰硕成果。

论坛开幕式由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张宝钧主持。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倪海东在致辞中表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正在成为决定未来全球格局的新力量。各个经济体需重新审视教育的使命与价值，深刻理解其在时代进程中的作用。他进一步提出四点主张：一是教育发展是应对全球变局的关键力量，教育不再只是培养个体的途径，而是塑造未来社会与文明的重要支柱；二是亚太合作应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方向，以建成更加均衡、更加包容、更加多元的教育互联互通新生态；三是语言文化是多元文明互鉴的基石，通过语言教育推动与人文精神、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四是青年应成为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主体力量，让青年具备跨文化理解、数字素养和人类关怀的能力。未来，北京语言大学将继续发挥在语言文化与国际教育方面的优势，与亚太各界携手，以连接促进理解与信任、以创新激发教育高质量发展动力、以合作实现人类发展共同愿景，助力书写亚太共荣共兴的新篇章。

秘鲁前副总统、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大学创始人劳尔·迪耶斯·坎赛科阁下在致辞中表示,在全球化时代,人才发掘与培养是最为重要的目标,数字化的加速转型也已经成为塑造未来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他坚信,教育已被证明是摆脱贫困、重塑人类文明的唯一途径。秘鲁正全力投入国家建设,积极推动教育发展,大力推进教育公平与区域合作,为青年创造连接世界、把握机遇的通道。他期待与会的各经济体通过论坛寻找更有价值的项目,搭建人才交流机会,为人民和青年创造一切可能的发展机遇,带来更大福祉。

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阁下在致辞中指出,技术作为变革驱动力带来了指数级变化,只有及时适应,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才能紧跟时代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教育领域的合作,是各经济体共同议题中的核心。为此,他提出新一代的世界公民必须具备的三种基础素养:一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愿意主动理解、接纳不同的理念和观点。二是具备全球视野,了解自身、集体及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看到世界全貌。三是保持好奇心并让其成为不断探索世界的驱动力。教育机构的职责在于创造有利条件,滋养并持续点燃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让学习的范围超越专业和时间,使其贯穿终身。

开幕式后,张宝钧副校长继续主持“科技发展与人类福祉”院士论坛。来自能源、语言、医学领域的三位科学家,分别从核聚变能源、生态文化记忆、络病理论创新出发,展示了科学研究如何切实推动社会进步、文化传承与人类福祉。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二维材料光电科技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主任范滇元以“人造小太阳”为例,介绍了核聚变能源造福人类的最新进展。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了核聚变模仿太阳产生能量的机制,指出核聚变原料取之不尽、清洁安全,代表未来能源发展方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探索,聚变能源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聚变点火的曙光已经显现,人类掌握高效优质的聚变能源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范院士认为,聚变能源的未来,不仅依赖科研突破,更依托教育的长期积累与人才支撑。APEC 各经济体需要通过开设能源科普课程、建设跨国实验室和推动校企合作,培养能源科技人才,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惠及全人类。

国际计算语言学委员会终身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讲座教授黄居仁以《文化传承与生态记忆》为题,阐释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智慧传承中的关键作用。他介绍了利用科技分析古代文献,建立生态知识图谱的具体实践,实现了文学、生态与科技的融合,并由此提出“生态记忆”概念。黄教授呼吁亚太地区加强教育合作,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挖

掘历史文献中的生态信息；将传统生态知识纳入现代教育体系；建立跨国合作机制，推动文化遗产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中医心血管病专家、中医络病学学科创立者吴以岭以《络病理论体系构建与创新转化》为题，介绍了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他的团队历经40余年系统构建中医络病学体系，并通过高质量循证研究为中医药走向国际建立了新标准，验证了中药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的有效性。吴院士还以带领团队成功研发连花清瘟胶囊为例，具体说明如何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融合现代科研方法，证实该药在甲流、新冠肺炎等多场疫情中的疗效，从而推动了中医药的国际认同与应用。他进一步表示，教育与科研是中医药创新的根基，医学生的系统培养和跨学科科研平台的建设，是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的重要动力。

院士论坛结束后，各经济体在论坛主题框架下，深入探讨了科技创新、教育互联、人才培养、生命健康、文明互鉴等重要议题，为亚太教育可持续发展凝聚了广泛共识。

议题一：科技创新、青年发展与亚太繁荣

在“科技创新、青年发展与亚太繁荣”分议题下，各发言人围绕人工智能教育、跨文化交流、青年人才培养与文化可持续发展展开深入研讨。吉林师范大学韩国籍教师、北京语言大学“新汉学计划”博士金涛煥展示了“人机协同”的AI语言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应成为学习设计者与引导者，通过人工智能提供个性化反馈，提升教学精准度与学习反思能力。智利麦哲伦大学副教授弗拉维亚·莫雷洛介绍了合恩角国际中心以“生物文化遗产”为核心的跨学科实践，倡导通过教育与科研合作促进社会创新与性别平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韩国籍“新汉学计划”博士生李广分享了博士教育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互动的研究成果，指出应通过政策协调与人才流动机制，推动亚太地区青年科研群体的可持续发展。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籍“新汉学计划”博士生武氏翠娥以老子哲学阐释“道法自然”理念在越南社会治理与青年价值观培育中的现实意义，展示了传统智慧在当代可持续发展中的启示作用。日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新汉学计划”联合培养博士生大町绮霞强调语言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桥梁作用，呼吁通过外语能力建设与跨文化教学创新，培养具备全球视野与沟通能力的青年人才。墨西哥驻华大使馆国际合作和教育事务主管安东尼指出，面对技术变革与知识快速迭代，教育应着力培养具备开放心态、全球视野与好奇精神的新一代领导者，使他们成为推动区域合作与社会创新的中坚力量。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与北京语言大学“新汉学计划”联合培养博士生欧阳乐士以“语言景观”为切入点，展示如何将城

市文化空间转化为跨文化教育资源，推动公平、可持续的国际理解教育。

议题二：教育联通与人才流动

在“教育联通与人才流动”分议题下，全体发言人在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助理司长吴世伟的主持下，集中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教育实践，打通人才培养与跨境流动的“最后一公里”，以实现亚太地区的创新协同与可持续繁荣。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教育参赞李健提出的“ABGCM 框架”成为讨论的政策主线：以学术联动实现学历互认与联合学位、以工商融合将行业需求嵌入课程与学徒体系、以政府引领提供制度性保障、以社区赋能夯实文化交流基础、以媒体传播放大青年创新声音，为区域人才流动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蓝图。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尹晓东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坚持在传承中发展，在互鉴中学习。戏剧是世界艺术门类中最独特的艺术样式，是认识世界、感悟人生的重要窗口。他特别介绍，学院在新加坡、美国设立中国戏曲海外教学实践基地、与多国高校共建文化中心，还通过举办国际戏曲节、组建“中外戏剧交流与合作联盟”，持续拓展青年参与国际对话的渠道，为艺术人才搭建跨文化协作的实践平台，以戏曲的美学精神沟通世界，引发跨越文化的共鸣与对话。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谦功提出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复合型”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强调跨学科与实践导向，有助于提升语言人才的时代需求、跨国适应与就业能力。文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哈贾·哈迪玛·哈吉·穆罕默德·赛义德介绍了文莱教学硕士项目（MTeach），分享了教师资格与培训体系互认、沉浸式实习与灵活学制的实践经验，为亚太地区教师教育培训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天津大学教授魏建国展示了团队在“智能音视频赋能言语康复”领域的突破性成果，利用动态核磁与语音建模实现发音可视化，为特殊教育群体的康复训练与教学资源共享开辟了新路径，体现了科技创新在包容性教育中的价值。腾讯研究院智慧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朋阳分享了腾讯在 AIGC 教育领域的探索，提出“AI 作为知识处理超级外脑”的理念，通过教育智能体平台与青少年 AIGC 工作坊，推动智能化学习与教学任务协同，助力个性化学习与教育公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殷传涛以北航中法工程师联合培养设计理念和“本硕贯通、预科与工程师联动”的培养模式为例，示范了如何通过深度产教融合保障工程人才的国际化培养与行业对接。

议题三：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

“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分议题集中展现了亚太各经济体在语言、文化与教育领域推动文明互鉴的多样路径。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劲松以普通话、粤语与越南语为例，以量化研究

揭示声调在语言交际中的真实“功能重量”，为跨语言比较与语言教学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越南胡志明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阮福禄系统阐述了越南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与结构性挑战，指出中文教育正成为推动中越文明互鉴和人文合作的关键纽带。北京外国语大学泰国籍学者谢玉冰教授以《西游记》和神猴文化研究为例，呈现中泰学术与民间文化交流的延续性，倡导以经典叙事为媒介促进区域文明共鸣。文莱大学语言中心主任朱莉安娜·沙克·波·卡姆介绍了人工智能赋能的语言教育战略，通过反思 AI 使用、个性化学习与跨文化协作，探索在保障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新西兰特库拉·考帕帕·莫图哈克·奥·陶维奥学校副校长薇薇安·希金斯分享了原住民学校通过多语言教育实现文化赋能的实践，展示了小语种教育如何成为文化认同与全球连接的桥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方铭以敦煌莫高窟为例，揭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中西文明交流枢纽的独特价值，强调其艺术形态和学术研究体现了文明对话与文化共生的历史深度。智利麦哲伦大学教授何塞·通科介绍了卡瓦斯卡语言与文化复兴的成功经验，通过辞典编纂、教材建设与社区参与实现濒危语言的活态传承，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示范。

经过深入交流与充分讨论，各经济体代表一致认为，应以教育为纽带，推动科技创新、人才流动与文明互鉴，深化区域合作、强化青年交流、促进数字共融，为亚太可持续繁荣注入新动力。为落实《APEC 教育战略》，推动亚太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影响力，论坛向各经济体发出四点倡议：一是要加快亚太科技创新，以数字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人类福祉；二是要加强亚太教育联通，以人才流动推动区域合作，助力亚太繁荣；三是要深化文明互鉴内涵，以人文交流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文明共兴；四是要拓展青年交流平台，以青春力量激发前进动力，夯实亚太未来之基。论坛的成功举办，也充分彰显了北京语言大学在全球教育对话、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引领角色，为中国教育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生动实践，也为构建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共兴共荣的亚太教育共同体贡献了北语智慧与中国力量。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新闻网）

G20 教育对话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举行 凝聚共识助推全球教育转型

为响应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助力全球教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10 月 27 日

至 29 日，G20 教育对话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合办，主题为“教育、可持续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会议包括 G20 教育对话、可持续发展目标系列对话、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等三个部分。来自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和嘉宾国的政策制定者、教育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会议。

10 月 27 日，**G20 教育对话**在北外举行。北外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欣路，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副校长诺曼·莫西亚出席会议并致辞。刘欣路表示，本次对话恰逢其时、意义重大，既是对 2024 年对话的延续，也是借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之机，为各国教育变革与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动能。北外期待与全球伙伴再次携手，促进民心相通，汇聚全球力量，提升教育韧性，共同为落实 2030 年议程、培育时代新人贡献力量。诺曼·莫西亚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大家共同承诺。虽然各位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着复杂各异的国情，但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每个人都彼此需要、相互依存。

山东大学校长助理、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邢占军，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研究员、阿根廷比较教育学会会长费利西塔斯·阿科斯塔，意大利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罗莎·博蒂诺，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围绕“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从课堂到社会”分别作主旨报告。来自墨西哥、土耳其、加拿大、欧盟及俄罗斯的嘉宾围绕“面向未来的教育研究与合作”进行了主题对话。会上启动了《基础教育中的可持续发展行动：中国案例》编写工作。

10 月 28 日，以“负责任消费与生产”“气候行动”“人工智能赋能优质教育”“良好健康与福祉”为主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话**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及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分别举行。对话展示了各中小学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先进实践。

10 月 29 日，作为第 26 届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平行会议的“**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王鲁新，北外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主任牛华勇，法政国际教育创始人、北京王府学校总校长王广发分别致开幕词。王鲁新指出，教育是驱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引擎，是应对全球多重危机、促进人类共同进步的核心力量，也是连接不同文明、推动共同发展的桥梁。期待有关各方怀揣开放之心，秉持合作之诚，分享宝贵经验，凝聚共识力量，助力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来自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德国、中国等 G20 成员国和泰国、马来西亚

等嘉宾国的政府部门、高校与研究机构，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与会嘉宾围绕“大学科研国际合作：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如何助力可持续发展”“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范式转换”进行了主题发言与对话。

北外高端学术会议项目“G20 教育对话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负责人王燕、施普林格自然中国区图书总裁李琰就《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路径与方法：中国案例》进行签约。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路径与模式，旨在为全球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中国经验与参考。会上还启动了教育合作机制，来自南非、泰国、阿根廷、墨西哥、意大利的代表分享了关于面向未来的国际教育合作机制的理念与愿景。

G20 教育对话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由北外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区域国别、国际组织与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交叉创新平台承办，北京教育学院基础教育国际课程中心、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北京市海淀区稻香湖学校协办。本次会议不仅是一次思想碰撞，更有利于推动全球教育合作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书写人工智能时代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崭新篇章。

（来源：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网）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发布 我国热点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一

科技论文是衡量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10月30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对2024年度我国科技论文产出情况进行整体分析。根据报告，我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位，热点论文数量同样独占鳌头。

各学科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可以被看作世界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报告统计，2024年全球178个学科中高影响力期刊共有163种（含学科交叉期刊），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上的论文总数为42757篇，中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5067篇，占世界总量的35.2%，排在世界第一位。

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则是指发表在经遴选的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上的论文，该类期刊须同时符合“影响因子和总被引用次数同居本学科前10%”及“每年刊载的学术论文及

述评文章数大于 50 篇”两项标准。2024 年，共有 377 种国际科技期刊入选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 39.51 万篇。按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 15.49 万篇，占世界总量的 39.2%，被引用次数为 101.12 万次，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位列世界第一。

在热点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上，中国表现同样亮眼。记者了解到，热点论文是指近两年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周期内得到大量引用，且被引用次数进入本学科前千分之一的论文。高被引论文是指各学科论文近十年被引用次数处于世界前 1% 的论文。截至 2025 年 8 月，中国的热点论文数为 2342 篇，占世界热点论文总数的 53.2%，数量比 2024 年统计时增加了 4.6%，世界排名再次居第一位。美国的热点论文数为 1511 篇，居第二位。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为 76271 篇，占世界份额 37.41%，相比去年统计时的世界占比增加了 3.6%，排在世界第二位，与排名第一位的美国相比仅差 11 篇，两国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差距越来越小。

论文的引用次数也是一项重要的统计与评价指标。报告显示，据近十年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国际论文，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17.24 次，连续两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 16.43 次。

中国国际科技论文被国际科技论文引用，可以反映出全球科技界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关注程度。报告统计，2024 年，中国论文在发表当年即获得引用的论文中，四成以上是国际引用。分析发现，印度成为引用中国论文数量和引用次数最多的国家，其次为美国和韩国；中国在化学、临床医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受到国际引用较多。

此外，报告显示，2024 年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开放合作，2024 年中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中，国际合著论文为 17.29 万篇，比 2023 年增加 14.4%，国际合著论文占中国发表论文总数的 20.4%。同时，中国高被引论文中，以我为主的国际合著论文占比接近 1/3。

中国国际科技期刊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报告指出，在国内外科技期刊中，中国国际科技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7.436，相比 2023 年上升 16.4%，说明中国国际科技期刊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期刊已由 2023 年的 44 种增加至 57 种，影响因子大于 20 的期刊共有 19 种，表明进入本学科前列的中国国际科技期刊数量上升显著。中国国际科技期刊的平均总被引用次数为 6399 次，增长 18.9%。总被引用次数超过万次的期刊有 28 种，总被引用次数超过 2 万次的期刊有 14 种。

（来源：《光明日报》2025 年 11 月 5 日第 8 版）

第十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

10月31日至11月2日,由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第十届全国教育博士论坛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来自全国43家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的教育专家和管理人员、教育博士生等450人参加论坛,共同探讨数字时代教育博士培养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沿议题。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缪建东教授指出,教育博士培养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须紧跟数智技术发展步伐,创新培养机制,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主旨报告环节,来自西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的学者围绕“行动的思想方法与教育博士培养方式创新”“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意涵”“为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而研究”“学术通融:教育专博五位一体培养体系构建”等话题作了分享交流。

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任平在论坛上介绍了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士培养经验和办学特色。教育博士培养经验交流环节,12家教育博士培养单位代表进行了教育博士培养经验交流。在5个平行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和教育博士生围绕“智能技术驱动的课程与教学创新研究”“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治理与学校生态重构”“人工智能赋能的人才培养机制改革研究”等主题进行了研讨。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河北省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建设研讨会在石家庄举办

10月30日,河北省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建设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燕山大学等高校近百名专家学者和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共商高校人工智能专业建设和高端制造业服务业所需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大计。

会议期间,河北工业大学教授陈鹤、武汉大学教授郭迟、燕山大学教授吴培良、天津工业大学教授李宝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任王学运、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教副总经理张超等分别就“人工智能赋能‘工学并举’”“数智教育整体布局”等主题做学术报告,

分享前沿实践经验。

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华北地区领先的人工智能教育基地,现场体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冠军——“天工”的互动展示,参与具身智能共研共创中心建设方案的讲解与机器人实操体验,并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专业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等议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此次活动由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主办,河北省高校专业建设研究服务中心、河北工业大学、井陉县科学技术协会承办,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基地共同协办。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际动态 | 欧盟力推微证书以应对技能短缺 但跨域认可与整合仍面临挑战

阅读提示: 据大学世界新闻 (University World News) 10 月 28 日报道, 全球范围内, 微证书 (micro-credentials) 正在成为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工具, 旨在提供短期、针对性的技能学习。然而, 其在欧洲的跨国认可和整合仍面临挑战。欧盟推动了微证书的发展, 并通过政策建议支持其在 27 个成员国的实施, 但各国发展速度和方式不一, 导致可转移性 (transferability) 和可叠加性 (stackability) 的问题。专家认为, 微证书可以补充传统学位教育, 帮助学习者实现终身学习目标, 并提升就业竞争力。然而, 政策框架、质量保证和教育机构的合作仍需进一步完善。以下是报道要点。

为应对快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技能短缺问题, 欧盟及其关联机构正积极推动微证书 (micro-credentials) 在欧洲的发展与应用。微证书被定义为在紧缺领域提供的“短期、有针对性的学习经历”, 旨在成为一种透明且便携的资格证明, 被视为弥合技能差距的有力工具。尽管所有 27 个成员国已根据 2022 年 6 月欧盟理事会关于微证书的《建议 (COUNCIL RECOMMENDATION of 16 June 2022 on a European approach to micro-credential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employability)》着手开发此类项目, 但其发展步伐和模式因国而异, 导致了系统多样化的风险, 对跨国转移性和统一性构成了挑战。

专家指出, 微证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补充而非取代传统学位。例如, 学生可在攻读历史学位的同期获得沟通或项目管理方面的微证书, 这有助于终身学习并提升职场竞争力。

然而,要使微证书真正得到学习者和雇主的重视,仍需在“可叠加性(stackability)”和“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方面做出大量努力。目前,微证书的路径和认可机制对许多人而言仍显复杂难懂。

欧盟委员会强调,推广微证书是“欧洲技能联盟”战略的关键优先事项,其目标是确保这些证书可信、易于理解、以数字形式颁发,并能跨行业和国家进行比较。虽然欧盟《建议》涵盖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公共就业服务,并允许微证书在适当情况下进行组合叠加,但具体实施与否则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包括“下一代欧盟”、“伊拉斯谟+”、欧洲社会基金Plus在内的多项欧盟资金正被用于支持相关的项目与改革。例如,“欧洲大学倡议”已借助欧盟资助,推动了超过430门可获得微证书的短期课程。

在实践中,微证书近年来在欧洲各个经济部门和教育层级迅速普及。它们被认为能增加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职业教育供给,支持国家、地区及行业的技能提升战略。然而,要将微证书有效纳入国家资历体系和框架,并为其认可创造条件,尚需显著的政策进展和研究支持。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等机构指出,若无高等院校、政府与雇主之间的紧密合作,将存在课程碎片化、严谨性不足以及微证书价值不被承认的风险。

质量保障是另一大挑战。尽管欧洲的质量保证标准适用于包括微证书在内的高等教育提供,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高效且低成本地验证其质量仍是难题。建立经过外部验证的可靠内部机制被视为可行之道。此外,关于将微证书堆叠成完整学位的设想也引发了争议,涉及学位授予主体、依据以及传统认证机制如何适用等问题。

与美国被形容为“狂野西部”的分散发展模式不同,欧洲的整体策略强调一致性与协调性,致力于将微证书融入现有体系,并通过“欧洲数字凭证”、“欧洲通行证”及“个人学习账户”等举措予以支持,力求避免成员国之间设置壁垒。总体而言,业界共识是微证书将与传统学历教育共存互补,其主要优势在于能以灵活、低风险的方式满足非传统学生群体的需求,并在国际招生与合作中发挥战略性作用。展望未来,尽管微证书的发展前景广阔,但要实现其在全欧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和价值兑现,仍需克服认可度、可持续商业模式及系统性整合等诸多障碍。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

国际动态 | 最新报告显示亚洲正在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

阅读提示：最近，“留学信息门户”（Studyportals）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发布报告，认为亚洲高等教育正在重塑全球学术格局，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报告显示，亚洲在跨国教育（Transnational Education, TNE）机构和世界排名大学的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过去十年中，排名前100的大学数量翻了一番。中国、日本、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主要留学目的地，而越南和印尼等新兴目的地也在本科生中显示出强劲增长。同时，报告指出，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更加注重性价比、在线学习机会以及明确的职业发展路径。以下是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相关报道要点。

根据“留学信息门户”（Studyportals）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最新发布的报告，亚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国际高等教育的版图。该地区目前提供超过两万个英语授课项目，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日本以及新兴的泰国、越南和印尼等国正积极吸引海外学生，尤其区域内流动日益显著。这标志着传统上由英美澳加等英语国家主导的国际高等教育模式受到挑战，竞争格局因那些曾被视为“生源输出地”的地区主动定位为留学目的地而被重构。

在具体国别表现中，日本和中国展现出最高的整体学生需求增长。日本在硕士层面领先，而中国本科阶段的相对增长最为强劲，显示其高校吸引力快速提升。马来西亚、印度和台湾等地需求亦呈温和增长，体现其区域竞争力；然而，韩国与新加坡在本科和硕士层级均出现显著下滑，反映短期吸引力减弱。东南亚新兴目的地表现分化明显：印尼和越南的本科需求急剧上升，可能得益于区域流动协议、费用优势及英语授课项目的改善；相反，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则因营销不足或社会动荡等因素遭遇大幅下跌。

亚洲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体现在学生流动，更通过跨国教育和学术排名得以巩固。区内世界排名前列的高校数量已从十年前的约两百所增至近六百所，百强大学数量翻倍，绝对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在跨国教育方面，亚洲拥有最多机构，例如印度的马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Manipal Academy of Higher Education, MAHE）通过在马来西亚和安提瓜设立分校，一年内将课程拓展至四百个项目，成功吸引了尼泊尔、中东及非洲学生，并与欧洲多国开展交换计划，凸显其主动塑造全球教育体系的角色。

与此同时，南亚依然是区域内最主要的学生输出地。在本科层面，孟加拉、巴基斯坦和

印度三国占据亚洲外需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孟加拉占比达 28.6%；而在硕士阶段，印度虽仍占近三分之一份额，但其比例在过去一年锐减 8.1 个百分点，这可能与英美签证收紧、毕业后工作权利受限以及欧洲替代选项兴起有关。报告警示，尽管南亚大规模生源带来稳定性，但过度依赖少数市场可能掩盖东亚和东南亚较小却具潜力的国家的战略价值。

学生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愈加关注性价比、在线与混合学习模式以及清晰的职业路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基础设施联通与贸易合作，促进了区域学生流动，许多青年希望借此把握新兴机遇。正如巴基斯坦硕士生法里哈（Fariha）在武汉大学所言，她选择中国是因为其在全球秩序转型中的独特视角与实践价值。此外，报告引用战略顾问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的观点指出，亚洲正通过基建整合、贸易协定及跨境资本流动加速内部融合，形成与西方内向保守倾向迥异的乐观全球化视野。

值得关注的是，亚洲主要教育枢纽在策略上有所调整：印度在本硕两个层面显著扩张，彰显其成为全球教育中心的雄心；新加坡课程供给持续增加，却面临需求下降导致的潜在过剩；中日韩则缩减或维持英语授课项目规模，反映出院校正转向更具国际吸引力或招生前景明确的领域，进行战略性校准。

总之，亚洲已确立确立为全球高等教育中清晰的引领者：它拥有最大规模的英语授课课程体系、快速成长的跨国教育网络以及在排行榜上不断跃升的机构能见度。虽然英语系国家的传统主导地位依然存在，但亚洲通过强化区域协作、提升教育品质与创新合作模式，不仅参与更是积极重绘国际高等教育的未来地图。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

国际动态 | 英国发布报告呼吁重塑高等教育 迈向可持续经济与知识共享的根本性改革

阅读提示：10月30日，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发布《呼吁根本性改革：面向可持续经济的高等教育（A Call for Radical Reform: Higher Education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y）》报告。报告认为太多学生选择全日制荣誉学位导致高等教育“过度消费”，而这种学位模式起源于大学规模较小且精英化的时期。作者蒂姆·布莱克曼（Tim Blackman）教授在报告中提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更多人学习短期课程，分散费用，同时鼓励终身学习。他建议通过政

府直接干预和课程标准化来改革高等教育，以应对气候变化和错误信息等“生存性”挑战。报告还批评了现有复杂的监管体系，提议采用更简单的方式监督大学策略和绩效。以下是报告要点。

在当今全球面临气候变化、债务攀升与虚假信息交织的多重危机下，高等教育体系亟需根本性变革。蒂姆·布莱克曼（Tim Blackman）指出，高等教育是实现向可持续经济转型及对抗错误信息的核心资源。然而现行模式过度依赖全日制荣誉学位（full-time honours degrees），这种起源于精英教育的制度已无法适应大众化、终身学习的需求，反而导致“教育过度消费”，加剧了公共财政与学生个人的债务负担。

面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全球碳排放持续上升，环境临界点日益逼近。在此背景下，应借鉴迪特尔·赫尔姆（Dieter Helm）提出的资产维护理论，将自然资本、基础设施和教育视为必须通过当前收入维持而非借贷的核心资产。高等教育本身既是投资也是消费，但当前许多学位课程的内容与模式未能有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反而因其高成本与低效率成为不可持续的负担。因此，必须推动课程结构向更短学制、模块化学习转变，推广证书（Certificates）、文凭（Diplomas）等灵活资格认证，以适应不同人生阶段的学习需求，减少居住式学习的碳足迹，鼓励通勤或在线参与。

同时，构建“知识共享体”（knowledge commons）至关重要。当前社会信任度普遍下降，公众对政府与企业领导者的误导行为持高度怀疑态度。高等教育机构需强化其社会责任，倡导严谨、尊重证据、开放批评的学术标准，并将这些原则引入公共讨论中。例如，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与BBC合作制作的《蓝色星球II（Blue Planet II）》不仅普及了环保知识，还引发了大规模行为改变，展示了学术界与媒体合作的巨大影响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报告提出五项关键政策建议：第一，将可持续经济目标全面融入课程设置与研究方向，建立强制性碳核算模型；第二，大幅缩减全日制学位规模，转向终身学习模式，并通过标准化课程提升效率；第三，确立国家层面的学术知识标准，支持学者参与公共对话以应对虚假信息；第四，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手段提高教育生产力，降低学生与公共债务；第五，简化监管机制，采用更精益的治理方式，如设立专员负责审批高校战略与绩效评估。

总之，高等教育必须从传统的精英化、集中式模式转变为普惠、灵活且高效的终身学习系统。这不仅关乎经济的可持续性与环境的未来，更是重建社会信任与共同认知基础的必由

之路。唯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重构,高等教育才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发挥其应有的关键作用。

(来源: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官网)

院校动态 | 华南师范大学:为澳门教育腾飞“插上翅膀”

“40年前,澳门师资紧缺,是华南师大送来‘及时雨’,为我们量身打造函授课程。”作为华南师范大学1985年在澳门招收的第一批校外文凭课程学生,澳门菜农子弟学校校长王国英感慨良多。

梁咏茵是王国英的学生,也是华南师大在澳门招收的2025级新生。“从幼儿园至中学,我的许多老师都来自华南师大,让我亲身感受到‘为人师表’的温度,也坚定了我从教的理想。”她立志接过教育薪火,学成返澳,为更多学子授业解惑。

师生两代人的接力,是华南师大在澳门办学40周年的生动缩影。近日,华南师大庆祝在澳办学40周年系列活动在澳门举行。“40年前,我校应澳门所需,率先赴澳跨境办学。”华南师大党委副书记、校长杨中民回顾了学校开创内地高校培养港澳基础教育师资先河历程。

在40多年前,澳门还未形成系统的师资培养机制,不少在职教师没有师范学历,师资难以满足中小学的教学需求。华南师大面向澳门办学方式日渐多元,专业更加丰富,覆盖“本一硕一博”所有的办学层次。华南师大并于2000年,在澳门正式设立硕士研究生教学点。

21世纪初,华南师大以“按需设专业,因需育人才”为原则,紧密对接澳门基础教育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澳门紧缺专业,努力填补澳门教育及产业发展急需人才缺口。华南师大通过培养层次跃升、专业结构优化、课程实践深化等系列行动,构建以“专业精进”为主线的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为澳门输送适配本土发展的专业化力量。

“华南师大在澳门的办学,超越了单纯的知识传授与学历提升,促进了两地在教育理念、课程建设、师资培育与科研创新等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深度融合与互学互鉴。”从华南师大计算机学院毕业后,郑杰钊深耕澳门教育,现已成为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长、澳门劳校中学校长。

华南师大面向澳门等地学生开展融入教育,努力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支持。学校通过举办新生训练营、“湾区青年”和创新创业训练营项目、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等,

带动澳门等地学生在社会实践、文化考察活动中，增强对国情和社情的认知。

“我有幸三度受教于华南师范大学，在我心中埋下了‘以教育点亮未来’的种子。”袁金淑本硕博毕业于华南师大，现任澳门东南学校德育处助理主任。袁金淑对母校和导师充满了深情。

为给澳门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高层次人才，华南师大面向澳门持续丰富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类型，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面向澳门开设 19 个博士专业，78 个硕士专业，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2024 年，华南师大入选教育部“国优计划”，已在 6 所学校建立“国优计划”研究生实践基地，组织了 50 名教育硕士赴基地开展教育见习，拓展了实践教学深度和广度。

同时，华南师大发挥“双一流”大学的学科优势和师范特色，聚焦澳门所需、发挥华师所长，联通境内外办学，打通本硕博培养，贯通职前职后。学校联动澳门各界，探索打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立交桥”，成为澳门高层次师资补充、教育从业者学历提升的主渠道之一。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院校动态 | 东南大学以“四个聚焦”推动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东南大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着重从思想引领、自主培养、教学变革、载体创新四个方面发力，推动育人理念、路径、动能、生态革新升级，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卓越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育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一、聚焦思想引领，系统谋划人才培养理念

（一）创新思政体系建设。开展教育思想大研讨，重塑人才培养目标，创新打造“贯通·联通·融通”的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成立思政工作领导小组、“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工作领导小组会、专题工作推进会等，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施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思政理论课质量创优工程行动计划、“至善成长”学生卓越体验提升计划等，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加强学生思想引领和价值塑造。

(二) 弘扬教育家精神。印发《教师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考核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推进教育家精神纳入教师培训必修课,将教师思想引领融入课程教学创新与指导能力提升计划全过程,递进实施新教师入职培训、首开课培训、青年教师授课竞赛与培训、骨干成长培训、名师攀登计划,全力建设高素质师资。发挥全国模范教师等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大先生”等系列主题活动,创作《杨廷宝》《燃灯》等话剧,整理汇编《东南大学名人图录》和教育思想集锦,引导教师自觉做教育家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和践行者。

(三) 加强学生思想引领。出台思政课质量创优工程行动计划等文件,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建成工程伦理与智能社会、信息时代的创新思维等500余门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筑牢思政教育主阵地。依托红色大讲堂、赴基层就业出征仪式等活动,将思政教育贯通第二课堂,加强社会实践、创新创业实践中的思想引领。校领导进课堂、社区开展“专题思政课”“开学第一课”“校长午餐会”等活动,深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持续加强思想引领。

二、聚焦自主培养,融会贯通人才培养路径

(一) 坚持通专融合,打造“1+N+M”通识教育。系统重构通识教育模式,以通识教育理念统筹引领专业课程建设,以专业教育水准对标建设通识教育课程,打造“1门”院士领衔、激发新生学术志趣的通识先导高峰课程,设计“N维”(多维度)助力人工智能素养、思辨与逻辑、设计与计算思维和领导力培养的通识核心课程,建设“M门”(若干门)彰显学科优势特色的高起点、高品质、高标准的精品选修课程,提升理工医科人文底蕴,厚植人文学科科学素养根基。

(二) 坚持科教融汇,构建“双链四联”创新教育。架构“专业教育、创新实践和知识拓展、创业训练”双螺旋学习课堂,将500余项前沿成果深度融入教学与实验,开设200余门创新创业理论金课,将创新教育有机融入1000余门专业核心课程,强化学生专业能力与创新素养。精心遴选培育潜力人才和项目种子,打造“项目研种、竞赛促种、双百选种、平台孵种”驱动的实践课堂体系,系统推进创新教育走深走实。依托4600余项落地项目开展研习实训,以150余项高水平竞赛为牵引激发活力,通过“百名导师+百项项目”机制精准选育潜力人才,借助校内外多层次孵化平台提供全方位支持,全面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与创业实践落地,构建起贯通融合、持续循环的创新创业育人新生态。

(三) 坚持交叉融通,布局“跨界复合”体系架构。加快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

目建设,推动“英语+信息工程”等9个项目的培养方案在课程、实践等环节跨学科交叉。配套出台本科微专业项目、学科交叉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学科交叉毕业设计三个专项实施方案,累计立项15个微专业,支持400余项交叉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组建100余个交叉毕业设计团队,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学科交叉人才培养体系。加大课程、专业、学科等多层次交叉,深度融合资源,依托未来技术学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推动“未来机器人”等13个专业实现工科人才跨界交叉融合培养,推动复合型拔尖人才培养。

三、聚焦教学变革,持续激发人才培养动能

(一)一体推进教学改革。印发《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至善课堂”教师卓越教学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等文件,召开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专题会,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实施融合个性化教学设计、智能工具应用、知识图谱构建、沉浸式实验体验、虚拟学习社区及智慧评价决策等六大教学改革,强化个性化教学设计,根据学生能力差异定制学习路径,促进学生学业水平提升。

(二)升级教学资源体系。依托新工科建设与学科交叉优势,系统构建涵盖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等多层次课程体系。聚焦前沿领域建成“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等244门在线开放课程群,上线工程经济学原理等133门国家平台精品课,组织编纂土力学等400余部国家级与省部级规划教材,围绕新工科、交叉学科及传统优势专业新编80余种创新教材,持续激发“新兴+”教学动能。

(三)人工智能赋能教学。实施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行动方案,构建由AI通识教育、领域基础、专业核心、跨学科选修组成的课程体系,建立“问题链+项目化”跨学期课程,嵌入“提问—猜想—验证”探究式学习模块,重塑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等250余门智能示范课程。实施“AI+教育”专项教学改革工程,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累计立项100余项教改项目,覆盖全校所有院系。深化AI赋能教学核心环节,凝练形成新工科背景下基于AI的现代光学基础智慧化教学等20个“人工智能+教育”典型案例,推动教学体系沿“数字基座—智能场景—范式重构”路径跃升,构筑“智能+”教学新范式。

四、聚焦载体创新,协同优化人才培养生态

(一)实行全程导师制。为每位本科生配备由专业教师、企业专家、优秀校友共同组成的学院导师和书院导师团队,学院导师聚焦学术能力提升,负责学科前沿引导、科研训练及创新能力培养;书院导师注重人格塑造与综合素质培养,通过通识教育、生涯规划及社会实

践，强化价值观引导。邀请院士、行业专家、非遗传承人等担任社区导师，举办“导师会客厅”“院长面对面”等活动，形成“沉浸式”成长引领模式。

（二）打造“书院融合体”。深化秉文书院、健雄书院等7大特色书院改革，通过学科集群交叉、空间场景再造、制度供给创新三维驱动，打造“学院知识赋能+书院人格润泽”特色培养模式，助力学生全面成长。实施学院协同管理书院制度，学院和书院合理分工，学院主要负责教学工作，书院负责第一课堂以外的包括素质教育、人格养成、思政教育等各类教育设计，形成人才培养强大合力。

（三）构筑“社区生态体”。打造“党建网格化引领—文化浸润式培育—数字精准化服务”的立体化社区育人网络，在社区设立党建工作站、党支部、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实施“党员先锋岗”挂牌制度，600余间“党员宿舍”辐射带动全体学生，形成多元协同的社区育人新生态。建设“数智东南”一站式服务平台，集成教务、学工、心理等13大系统模块，上线“场馆预约”“心理咨询”等60余项功能，实现服务“指尖化”、管理“数据化”。开发学生成长画像系统，整合学业、实践等数据，精准把握学生成长状态，赋能个性化培养，覆盖全校近4万名学生，提升学生思辨力、创造力，推动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来源：教育部简报〔2025〕第36期）

院校动态 | 同济大学发布“人工智能协同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规划”

10月27日，同济大学与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共建的国际中文教育信息化实践与研究基地正式发布《人工智能协同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规划》（下称：规划），将重点推进三大任务。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孙宜学27日受访时介绍，25日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协同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论坛上，该规划正式发布，系统展示国际中文教育信息化实践与研究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展望“十五五”期间的重点发展方向。

孙宜学表示，该规划旨在贯彻同济大学“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赋能高等教育的系统规划，打造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重点推进三大任务：一是建设数智教学新基建，利用已建成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知识图谱与知识库，研发具备精准语言教学、跨文

化互动与自适应评估能力的专属智能引擎，为全球学习者提供高度数智化、个性化的学习平台；二是建立绿色人文新范式，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国际中文教育全链条，优化在线沉浸式学习体验、共享数字教学资源，降低国际中文教育碳足迹；三是建构融合育人新生态，依托同济学科优势，重点开发“中文+工程”等数智课程，并创新 AI 助教与教师协同的“双师模式”，规模化培养具备卓越数字素养的国际中文师资，为新时代全球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科学发展注入新动能，开辟新赛道，为辅助世界开展好中文教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同济智慧。

论坛开幕式上，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指出，数智时代的国际中文教育应凝聚智慧，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使中文学习更加高效、愉悦，吸引更多国际学生爱上中文、理解中国，从而推动更高水平的中外人文交流。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剑青强调，数字化转型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共建协同创新生态、打造全场景解决方案，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助力教师提质增效。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国际交流处处长周勤健介绍了上海高校在“AI+中文”领域的整体布局与实践进展，指出孔子学院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在上海高校共同努力下，正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

论坛特邀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国际中文教育的智变跃迁：新场景、新资源、新路径”的主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实践案例。与会学者表示，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各方将继续深化合作，以科技赋能人文交流，以语言联通世界，共同为增进国际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新篇章。

（来源：中国新闻网）

高教研究

地方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破局之道 | 刘建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高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应主动扛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聚焦人才自主培养，着力造就新时代创新人才。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地方高校要立足地方，结合自身特点

和实际情况,充分挖掘育人要素,创新育人方式,实现差异化、特色化人才培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尊重学生个性。尊重学生个性是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兴趣、能力、思维方式和成长节奏,创新是他们的天性。地方高校要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价值旨归,以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为价值追求,把学生个性发展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要结合学校特色和学生特点,尊重个性和兴趣,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不断满足学生的发展和成才需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欲望、激活创新潜能、释放创新本能,努力将每一名学生都培养成为创新人才。

激发内生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事物内部,内因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创新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涵养优良的道德品质,激发他们创新的内生动力。地方高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培养他们乐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吃苦等良好的道德品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和进取品格,鼓励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充分激发他们对创新的内生动力。

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地方高校要坚持目标导向和实践导向,优化培养方案,动态调整课程布局,将创新能力培养深度嵌入课程之中,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发挥学科、人才和科研优势,建立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平台,坚持科教协同和学科融合培养,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发挥区位和行业优势,构建校地、校企联合培养机制,打造产学研用结合的协同育人平台;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力度,努力拓展学生国际视野和全球合作能力。

营造创新生态。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注重人才培养和投入,以形成支持创新的文化和环境。地方高校要强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为创新人才培养培育良好的成长土壤;大力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环境,让创新在全校蔚然成风;激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和创新活动中,充分激发学习兴趣和创新思维,培养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当前,创新人才培养已经跃升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众多地方高校立足地方,聚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开展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湖北大学作为较早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地方高校之一,于2008年成立楚才学院,负责组织实施“楚才计划”,旨在探索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17年来,楚才学院围绕地方高校办学定位和特色,形成了“四联四融,开放协同”的创新人才培养路径,即:一联党旗阵地,融合“五育”目标,厚植学生综合素质;二联著名高校,融汇优质资源,增强学生成才信心;三联产业行业,融通社会力量,激发学生创新动能;四联校内资源,融聚学科优势,提升学生学术志向。截至目前,楚才学院紧密面向国家、地方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已为社会输送了千余名品学兼优、专业扎实、素质过硬、求实创新的创新人才。近年来,学校在总结楚才学院办学经验及成效的基础上,正在以建设创新型大学为切入点,大力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更优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作者系湖北大学校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9日第5版)

追求质量、经世致用、国际引领:推动高校科研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 | 伍宸

科技投入持续增加,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人员总量世界第一;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和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世界第一……日前召开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我国“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在亮眼的数据背后,我们的科学研究更应该追求什么?笔者认为,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全面建成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新阶段,我们需要把追求卓越的科研质量作为中心任务,以经世致用作为科学研究的根本使命,以引领国际的科学研究为努力方向。唯此,我国科学研究事业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也才能够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以追求卓越的科研质量为中心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及科学研究事业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更是加快了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步伐。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诸多任务中,

科学研究占据着重要位置。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看,唯有那些能够持续产出世界一流学术研究成果并成为世界科学研究中心的国家,才可称之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规模得到了快速扩张,水平也大幅提升。其中主要的表现就是学术论文的国际发表数量和质量均有跨越式提升,在数量上已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从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看,论文的数量不等于质量,也不能简单等于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虽然我国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整体质量上与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尽管论文发表遥遥领先,但我们在基础、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方面仍需要追赶。平均而言,中国论文的引用次数还是低于来自美国、英国或欧盟的论文,且在《自然》《科学》这两大顶尖期刊上的发表数量仍少于传统学术强国。此外,从国际公认的科学大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等的获得数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为此,在高等教育发展新阶段,我国高校唯有持续产出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学术研究成果,才可能进一步为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夯实科学研究的基础。

接下来,我们需要以追求卓越的科学研究质量为中心任务,从办学理念、资源投入、评价制度等方面为追求卓越的科学研究质量扫清障碍。在办学理念上,要破除绩效至上主义的思维惯性,为研究者营造更为宽松和自由探究的学术氛围,为“十年磨一剑”和“板凳甘坐十年冷”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提供充足的制度和物质保障,尤其是要培养和保护科研工作者闲逸的好奇心,让他们能够提出有趣和前沿的科学研究问题并开展长期持续的探究,避免在科研 KPI 裹挟之下一味追求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从资源投入模式看,要摒弃投入产出的短期主义行为,更注重对研究者的长期资助,尤其是一些基础性、前沿性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巨大的风险性,所以需要进一步淡化对一些基础理论研究的短周期评价和频繁的过程性评价,让广大科研工作者不断树立起长期主义的科研态度;从学术评价制度改革来看,核心在于摒弃“以论文发表数量和期刊级别论成败”的固有导向,一方面,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激发研究者勇闯科技前沿、探索“无人区”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进一步积极探索以价值为核心的学术评价新模式,让研究的创新贡献与实际意义成为关键衡量标准。如,202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坂口志文,其改变免疫学研究进程的关键成果是 1995 年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三区所属期刊“JOURNAL OF IMMUNOLOGY”上。这一案例恰恰说明评价学术价值不应局限于期刊级别,而需聚焦研究本身的突破性意义。

以经世致用为科学研究根本使命

“经世致用”一词由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当时的伪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学术论文发表只是科学研究的表现形式之一,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价值在于帮助人类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贡献力量,以经世致用为根本使命。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广大科研工作者要以国家和民族的繁荣进步为使命,通过自身的科学研究活动为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接续奋斗。学术论文的发表固然能够加强学术同行的交流,促进学术体系的进步与繁荣,但学术论文的发表不是科学研究活动的终点,更不是其根本使命。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需实质性以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为重。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从论文国际发表到经世致用的历史性转变,并据此在科学研究模式、资源投入和评价制度等方面拿出系统性设计。

首先,要进一步构建起以实践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模式,将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作为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构建起“基础理论研究—科技成果开发—应用技术转化”三位一体的模式,既要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向上捅破天”而实现学术理论的创新,还要在应用技术转化上“向下扎根”而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在资源投入上,科研管理部门及高校要进一步将宝贵的科学研究资源投向制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关键领域,通过建立重大研究平台,开展重大研究课题而解决重大实践问题。

最后,从学术评价上看,要摒弃以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或期刊级别作为标准的评价体系,进一步以科学研究解决了什么理论或实践问题,对于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哪些实质性贡献等,作为衡量研究者及其科学研究活动价值的基本依据。

需要明确的是,经世致用的科学研究价值取向与自由探索并不矛盾,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自治性。前者是指开展科学研究要以根本性解决实践和理论问题为旨趣,而后者则更强调尊重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目的也在于充分激发研究者的创新能力以产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以引领国际科学研究为努力方向

从发展规律上看,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要成为世界科学研究中心,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对世界科学研究具有引领能力。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我国科学研究要通过“换道超车”等方式矢志实现引领国际的崇高理想。具体来说,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和探索。

首先,紧盯世界科学研究前沿方向,产出具有全球引领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当前,我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科学研究总量的积累,接下来,我们需要紧盯世界科学研究前沿,在人工智能、量子物理、可控核聚变、氢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积极布局 and 探索,以不断获得世界科学研究的引领性地位。

其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为科学研究具备引领性地位奠定基础。当前科研范式正在经历急剧变革,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解决系统性复杂问题成为新时代科研范式变革主要驱动力,仿真模拟和数据科学可能成为推动科研范式变革的有效突破口,科研活动组织创新成为推动科研范式变革的基础。2024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分别授予与人工智能(AI)相关的科学家,这正是当前科学研究范式急剧变革的鲜明例证。为此,我国科学研究要抢占这一战略机遇,通过范式转型实现科学研究战略性引领。

最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还要有强烈的敢为人先的胆魄和能力,通过积极开辟科学研究的新领域、勇闯“无人区”而实现“换道超车”。事实上,纵观历年国际顶尖自然科学奖项的获奖名单,审视获奖者及其科研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前沿性、开创性和引领性是其基本价值取向,而这也是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不断求索的方向。

(作者:伍宸,系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宁波大学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5 年 10 月 28 日第 15 版)

“十五五”规划编制 | 国家教育“十五五”规划深度解读 | 李星杰

2025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发布,其中对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这标志着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与规模并重的发展新阶段迈进。

一、提质扩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这一政策导向回应了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新需求。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60.8%，累计向社会输送 5500 万人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张男星表示：“高等教育品质已成为决定国家人才供给和人力资源水平的关键因素。”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曾天山强调：“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征途上，高等教育发展既要实现量的合理增长，更要注重质的有效提升。”

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优质高校本科生招生扩容计划，稳步扩大高水平大学招生规模，使更多学生有机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

二、服务战略，深化高教供给侧改革

面对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庆市教委主任刘宴兵指出，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以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为核心，建立健全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预警和动态优化机制”。

这一改革思路包括三大具体路径：推动传统优势学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加强新兴交叉学科建设，以及前瞻布局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和特色专业学院。

全国政协常委孔令智建议构建高校动态学科生态，建立需求导向的调整机制，加强基础与交叉学科平台建设。

三、三位一体，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

“十五五”规划强调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推进的协调机制，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日益凸显。数据显示，高校获得了 75%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以及 55% 以上的科技进步奖。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将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

四、分类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分类发展成为“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全国政协常委孔令智建议实施高校分类评价，按“双一流”、应用型、技能型等定位差异化设置指标。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备受关注。张灼华常委提出应深化高等教育通识教育，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聚焦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周光礼指出：“在育人方式上，要更加注重学生能力建设和人格塑造，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强化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校办学模式也将迎来变革，更加注重融合办学，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让最新科研成果反哺教学。

五、区域响应，高校积极谋划新篇

面对“十五五”规划蓝图，各地高校积极响应。

兰州大学校长杨勇平表示，将“立足特色优势，主动担当作为，持续优化学科布局，推进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孵化，强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

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曹萍表示，学校将“锚定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李奕指出，将以新域新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就业预警、紧缺急需、前瞻布局“三张清单”为抓手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布局。

高等教育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多所高校已宣布将调整学科专业设置，一大批传统工科专业将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六、结语

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我国高等教育生态将迎来深刻变革，分类发展、特色办学成为主流趋势。

高校不再是千校一面，而是百花齐放、各具特色，在不同的定位中追求卓越，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各自的力量。

（来源：高校学科评价微信公众号）

“十五五”规划编制 | 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 | 卢伟

徐宏宇

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当前,高校已步入“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谋划期,然而,兼具战略引领性、科学性和可执行性的高质量规划仍然是“稀缺资源”。如何编制出高质量规划,进而引领高校高质量发展,需要系统回答并破解“谁来规划、规划什么、怎么规划”这三个层面的方法论难题。

谁来规划——多主体协同构建高质量规划决策共同体

高校规划编制属于公共知识型政策决策,由决策层、编制层和咨询层共同构成规划编制主体,是影响和决定规划质量的核心要素。

一方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规划编制,促进了决策知识的有效整合。决策层、编制层与咨询层各自拥有不同类型的异质性知识资源。以党委为核心的规划决策层,具备整体性和战略性思维,决策经验丰富;规划编制层直接负责规划的起草和撰写工作,掌握更多规划编制专门知识;规划咨询层则一般掌握宏观政策导向、地区发展需求、专业技术知识和学校实际问题等方面的知识。多主体的协同参与,能够有效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知识的互补与集成,进而增强规划内容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另一方面,多层次主体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的互动协商,有助于广泛吸纳师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回应他们的核心关切,确保规划程序公正、信息公开,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对规划合法性的认同以及对规划目标的共识度。基于此,高校以党委为核心的规划决策层,应秉持“实事求是”的规划决策哲学,持续强化战略学习,精准把握国家政策走向、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以及校情,切实提升战略决策能力。高校规划编制应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师生有机结合,转变“领导者”和“起草者”基于经验的传统二元互动规划编制决策模式。在加强规划决策层与编制层互动的同时,广泛吸纳咨询层以及其他规划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形成共识性规划决策模式。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通过“闯进来”“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汇聚民力、汇集民智,实现多主体高质量参与规划决策,通过“决策层审议、编制层协调、咨询层协商”等磨合方式实现规划集体决策。规划主体间相互磨合、民主协商、集体决策的过程,既是战略规划共识形成的过程,也是规划主体集体战略学习的过程。这使得规

划决策层、编制层和咨询层具备协同性、整体性、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与战略能力,进而构建“三元互动”的高质量规划决策共同体。

规划什么——坚持学科内外部发展逻辑有机统一

学科建设不仅关乎高校的高质量发展与核心竞争力,更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全局紧密相连。规划编制能否立足学科内外部发展逻辑并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是对高校战略动态能力的直接检验。战略动态能力涵盖战略机会的识别与运用、资源整合以及协调管理,分别对应规划中的战略目标、资源保障与行动方案3个关键点位。高校规划战略动态能力中所蕴含的诊断性、预测性、调节性、引领性功能,有助于高校基于优势学科提出并确定未来发展的新战略、变革性思路与行动,这是高校战略规划中管大局、管方向、管长远的核心战略能力。

规划编制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发展战略、办学思想、办学重心(学科建设)。高校须充分认识学科建设作为逻辑基点的地位,以及战略动态能力在提升规划质量方面的关键作用。高校规划战略动态能力并非凭空形成、一成不变,而是通过学习赋能、数字赋能、研究赋能持续提升的动态过程。这有助于高校持续加深对学校独特资源禀赋和学科发展特质的深度理解与精准把握,使规划决策主体能够在办学主线、发展定位、重点学科建设等关键战略问题上形成独到的战略定力与主见,进而持续夯实战略动态能力之基。具体而言,高校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遵循学科发展内外部逻辑,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以及国家、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确定重点学科及建设方向,探寻学科建设的新布局、新思路、新举措,注重目标提升与要素配置优化,确立基于学校优势特色学科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打造的资源配置机制、内部治理结构以及配套制度,让“做事”(基于学科发展编制规划)和“花钱”(基于学科建设配置资源)之间达成“帕累托最优”,形成优势学科的资源整合和创造性应用的机制,从而引导高校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提升其核心竞争力。

怎么规划——坚持系统观念与协同治理有机结合

秉持系统性、战略性和开放性的思维。只有当规划主体具备清晰的问题意识、目标意识与系统观念时,才能够从整体、协同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战略动态能力与规划方法,精准识别问题、设定目标、统筹资源,进而构建科学合理的规划体系。战略动态能力不仅影响规划主体是否“有意识”地使用科学方法,更影响这些方法能否真正“用得上”“用得好”。规划主体须认识到,规划方法不应沦为机械化、形式化的规划文本编制工具,而应成为将高校战

略意图转化为行动的关键有效媒介。

构建动态能力与规划方法的动态关联机制。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纵向上要遵循“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规划程序路径,注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交叉式规划编制方法运用,建立动态能力与规划方法之间的传导机制,打通规划编制的堵点、断点;横向上要综合运用 SWOT 分析法、标杆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规划方法,并加强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规划决策上的应用,构建服务规划编制全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数据支持系统,形成数字赋能高校战略规划动态能力与规划方法深层耦合机制。强化院校研究,建立与同类高校的战略规划经验交流机制,使高校领导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学校发展的关键战略讯息,以高维战略视野、权变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发展性眼光,立足学校看学校,跳出学校看学校,着眼于未来看学校,强化高校内外有机协同、互动达成最大公约数的战略共识,进而编制出科学、适切、可操作的高质量规划。

高校规划不应止步于编制高质量规划文本,更应注重规划文本的可执行性,以及规划过程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可持续性。高校须立足规划整体性治理,构建涵盖前期专题研究、主题调研、过程协同、成果评估与适时调整的全周期动态规划治理机制,确保规划始终保持动态更新、反复迭代的战略过程,推动高校规划范式从经验型规划向智慧型规划转型,从单向度建设向闭环整体性、协同性治理转型,最终实现以高质量规划为引领,推动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作者卢伟系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徐宏宇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 2021 年教育学一般课题“地方高校战略规划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研究”[BFA210065]的部分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 年 10 月 29 日第 5 版)

“十五五”规划编制 | 现代化治理改革推动高校“十五五”规划落地 | 蒲智勇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指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激发教育发展活力。”高校“十五五”规划作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是引领办学方向、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办学目标,进而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托。

然而,当前在高校治理实践中,“重规划轻实施”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具体表现为宏观的制度规定较多,而具体的保障执行力不足;自上而下的部署较多,而自下而上的多元参与不足。高校必须坚持和完善规划有效实施的机制,提升规划的执行力和落实力,聚焦规划实施,构建多元参与机制,全面提升治理效能,推动高校改革发展。

多元参与引领现代化治理新航向

当前,以效率优先、层级管控为核心的科层制管理仍然是我国高校较为普遍的管理模式。科层制管理更多是一元主体自上而下的一种计划和安排,强调上级对下级的指挥、管束和控制。现代化治理则高度重视多元主体自下而上的沟通与协调,强调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与行动。

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背景下,以高校发展规划为代表的战略管理与现代化治理呈现出目标引领与保障实施的双向互动关系。战略管理为现代化治理提供方向锚点,现代化治理为战略管理注入实施动能,二者协同构成了高校改革发展的核心支撑。唯有以战略目标引领治理改革,以治理创新支撑战略落地,才能构建起目标明确、多元参与、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现代大学治理生态,为高校规划实施及其目标的实现提供持久动能。

多元参与促进高校规划落地实施

对高校规划实施而言,若仅依赖科层制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易因脱离基层实际、缺乏执行共识而陷入“落地难”的困境。完善高校治理体系,深化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现代化治理改革,能够将多元利益主体深度嵌入规划执行的全链条,在多个层面形成独特优势,为规划落地提供系统性支持。

一是在问题发现上,多元参与的基层导向有利于相关利益主体更加精准高效地发现规划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将问题与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二是在科学决策上,多元参与有利于从专业领域、利益诉求等多个角度提供差异化建议,促使规划实施与调整更具全面性。三是在资源支持上,多元参与有利于推动相关利益主体将自身资源转化为规划实施的共同资源,形成“1+1>2”的执行合力,为规划目标实现提供多元资源保障。四是在主体成长上,多元参与与过程有利于相关利益主体从“规划旁观者”转变为“主动赋能者”,在切身参与中获得能力锻炼,增强对学校发展战略的价值认同,实现“规划落地”与“主体成长”的双向共赢。

科学设计构建多元参与决策机制

多元主体参与高校规划实施，并非简单的“主体叠加”，而是基于现代化治理理念，围绕规划实施的相关利益主体，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构建起“问题精准发现—建议全面供给—资源协同整合—主体共同成长”的多元参与决策机制，不断激发基层活力，为规划实施提供从“落地”到“提质”的良性循环。具体而言，需要回答“何人参与、何时参与、何以参与”等涉及决策主体、决策过程、决策支持的几个基本问题。

厘定参与主体。从发展环境的系统视角，要明确高校规划的内外利益结构，统筹好政府、企业、社会机构、校友、师生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从任务举措的过程视角，要依据规划任务的属性与实施场景，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任务对参与主体专业性、参与范围的要求，按照分类适配、权责联动的逻辑，构建参与主体体系；从评估反馈的结果视角，要确保参与主体既包含评估成效的判断者，也包含问题改进的建议者，避免评估反馈沦为“内部自评”的形式化流程。

优化参与过程。要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智库作用，形成问题解决的多种方案，在不同方案中择优进行决策，进而落实执行最优方案。因此，优化参与过程，核心在于围绕规划实施所涉及的任务领域，选择和组织与之相应的决策主体，在“问题—方案—决策—执行—问题”闭环模式中，积极推动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形成系统集成目标利益共同体，进而实现科学决策，推动规划实施。

提供参与支持。首先，完善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现代化治理体系。进一步细化多元参与的制度清单，不断提升高校治理的结构效能、制度效能与行动效能，破解现有治理组织“有形无神”“协同不足”的困境。其次，构建自下而上畅通高效的信息反馈渠道。聚焦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化需求，借助智能工具打破时空限制，明确问题反馈处理的责任时限，破解信息反馈滞后、响应缓慢、过滤失真等问题。再次，探索权力和责任相适应的参与式决策机制。纵向上要厘清高层、中层、基层决策边界，推动简政放权；横向上要构建部门独立决策与协同决策互补机制，实现“权力下放”与“责任绑定”，确保多元参与高效有序。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发展学院/陕西教师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本文系202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2025JGZ11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9日第5版）

服务区域发展 | 贴着需求走、围着产业转、瞄着实战干，重庆科技大学——做好服务区域发展“大文章” | 黎德龙 赵明阶

阅读提示：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如何实现从“参与者”到“驱动者”的角色跃升？这不仅是地方高校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更是其构筑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当高校真正将服务地方视为战略支点，其发展逻辑便从“资源输入”转向“价值共创”。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学科布局深度嵌入区域发展，高校的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得以深度融合，最终与城市和区域结成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2日“高教周刊”邀请专家学者与高校管理者，共同探寻校地双向赋能、共生共荣的实践方案。

地方高校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需有所作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更责无旁贷。

重庆科技大学立足成渝、面向全国，通过落实“科研攻关—产教融合—人才赋能”三维驱动模式，构建了高校与区域共生共荣的创新生态。

科研攻关贴着需求走

学校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推动科研从“论文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集中攻坚油气勘探开发、低碳冶金、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使学校创新链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链。

加强党建引领下的有组织科研。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党委在科研工作中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的职责，确保党组织在重大科研问题上的决策、参与和监督，全力打造与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党组织体系。校党委重点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聚焦重庆“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牵头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联盟，并积极加入区域和行业协同创新体系，不断深化政产学研深度合作。

加快建设国家级科研平台。加快推动国家油气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创新中心、非常规油气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和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全国重点实验室分室等高水平平台建设，切实推进重庆资源循环利用与碳中和技术研究院、重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院建设，

优化重组省部级科研平台,全力推进重庆智能数学与自主智能研究院等新型研究机构建设和运行。

加速突破重点科研项目。持续凝练科研方向,大力打造科研团队,布局重庆智能数学与自主智能研究院、健康环境研究院等交叉平台,深入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重点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500 万元以上企业科技攻关课题等重大项目上持续发力,力争获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B类)。

学科布局围着产业转

围绕重庆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战略需求,学校近年来以“强工、厚理、兴文、促交叉”为思路,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建设优势特色学科。学校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不断提升学科与产业的契合度,形成了以油气勘探与绿色开发、低碳冶金与先进材料、高端装备与电子信息等为主要特色的八大学科专业集群,学科直接对应支撑“33618”体系中 87%的产业。同时,持续凝练学科方向,初步确定重点建设学科 18 个,以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冶金工程优势学科以及化学、安全科学与工程等特色学科为主,引领、辐射、带动相关学科建设,在海上稠油注超临界多元热流体、冶金先进低碳工艺流程再造与二次资源利用等领域形成了比较优势和特色,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进入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学科排名前 1%。

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学校统筹推动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强化石油工程、冶金工程等传统优势专业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动态调整淘汰与产业适配度不足的专业 13 个,新设储能科学与工程、智能车辆工程、智慧水利等前沿交叉专业。

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健全学科交叉发展机制,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重大科研项目为牵引,开展交叉学科研究项目资助,建设交叉学科机构,推进学科融合,重点建设智慧油气田、智能零碳、智能安全等交叉学科群,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深化专业内涵建设,扎实推进高水平新工科建设和卓越工程师学院试点工作,通过重庆市第二轮高水平新工科建设高校验收,获批重庆市普通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特色优势专业群 2 个,2 个重庆市现代产业学院顺利通过验收。

协同创新瞄着实战干

学校近年来主动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将服务根系深扎川渝大地,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

向生产线，为区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创新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学校与重庆市政府共建重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研究院，相关研究成果获重庆市发展研究一等奖，并转化为全市资源循环产业政策。学校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与中石油、宝武集团等石油冶金行业头部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持续提升服务行业产业的能力。

精准布局激活区域创新生态。学校与西部（重庆）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管委会签订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占地920亩的重庆科技大学智慧创新中心，构建“校区—园区—城区”三区联动载体。这一布局既为油气装备智能运维、页岩气数字孪生等新兴方向提供了试验场，又通过“政府搭台—高校出智—企业落地”的协同机制，形成技术转化和产业孵化的闭环系统，使学校成为成渝科创走廊的关键节点。

打造良性人才引育机制。学校打造“近悦远来”人才生态，实施“领军人才—产业教授—技能大师”三级人才引育计划，柔性引进周守为等院士团队，选派教师赴企业担任技术副总，从企业聘请工程师担任产业导师。学校本科生培养通过理工创新实验班、校企合作订单班等多元模式，推动专业教育与实践教育深度融合；研究生培养实施“2461”模式，即与企业“双主体”协同，推进教学研用“四结合”，将职业素养与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贯穿全过程。

（作者黎德龙系重庆科技大学党委书记，赵明阶系重庆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2日第5版）

服务区域发展 | 筑基·架桥·落地：地方高校转型须向深而行 | 刘德仿 宋青 洪林

阅读提示：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如何实现从“参与者”到“驱动者”的角色跃升？这不仅是地方高校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更是其构筑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当高校真正将服务地方视为战略支点，其发展逻辑便从“资源输入”转向“价值共创”。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学科布局深度嵌入区域发展，高校的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得以深度融合，最终与城市和区域结成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教育报》2025年10月22日“高教周刊”邀请专家学者与高校管理者，共同探寻校地双向赋能、共生共荣的实践方案。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教育改革蓝图。在建设教育强国和技能型社会的时代坐标下，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高校如何摒弃追逐学术锦标赛的虚幻浮光，以坚实的步伐扎根祖国大地，锻造强国栋梁，留下与时代同频共振、砥砺奋进的铿锵足迹？

1 本土化筑基：从“悬浮办学”到“命运共生”

地方高校的关键资源，诸如财政拨款、生源质量与数量、毕业生就业渠道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在地方。因此，努力构建深度嵌入区域发展的校地命运共同体，是地方高校转型成功的关键。而一旦高校与区域发展需求脱节，其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当地社会的期望，将直接制约高校的生存与发展。

这种脱节带来的困境，在转型探索之前的一些地方高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某高校的毕业生曾深陷“企业不敢用、学生不会干”的尴尬境地。其机械专业的部分学生，即便苦学3年理论，再经过仓促实习，综合能力仍与真实的产业需求存在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导致毕业生难以实现从“校园理论”到“岗位实操”的有效衔接，陷入就业竞争力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使得当地企业在人才招聘中面临技能匹配度低、岗前培训成本高的现实难题。

浙江某科技学院通过“一县一院一产业”的模式，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范本。该校与绍兴市柯桥区共建纺织产业学院，开设“纺织智能制造”微专业；为金华永康市的五金企业提供“机器换人”技改服务，3年内助力数十家企业完成生产线升级。得益于此，该校毕业生本地就业率超过90%，真正实现了“办学在地方、扎根在地方、贡献在地方”的良性循环。

基于前述困境与成功实践，地方高校要系统性破解校地脱节难题，关键在于掌握以下三把“钥匙”：

一是以“需求”精准画像。地方高校可建立动态的产业需求数据库，并定期发布《区域产业人才需求白皮书》，从而精准破解企业“隐性需求”难以识别的首要关卡。

二是以“契约”整合资源。地方高校可借鉴东莞理工学院与松山湖高新区的合作模式：政府承诺每年投入2000万元资金，高校保障每年输送500名定制化人才，企业则以技术参与课程开发。通过权责明确的协议，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可持续合作生态。

三是以“制度”长效护航。地方高校可建立长效化市场化合作机制，避免“领导换届，

合作停摆”，从根本上保障校企合作的可靠性与持续性。

2 工程化架桥：打破“学科围墙”，锻造实战能力

成功转型的地方高校，往往致力于将“工程逻辑”深度融入传统的“学科逻辑”之中，并以此重构育人体系。

一是促进课堂教学与工程实践深度融合。具体路径包括：重构课程体系，如湖北某汽车工业学院将“机械原理”等课程拆解为“汽车生产线调试工具”等项目模块，让学生从大一起就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学习；搭建虚拟场景，如江苏某工学院开发“虚拟施工平台”，使学生在模拟完成桥梁建造的全流程中实现场景化教学；打造双能师资，如浙江万里学院通过实施教师企业经历制度与聘任“产业教授”，使“双师型”教师占比超过60%，有效带动学生工程竞赛获奖数增长3倍，最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二是将产业学院打造为工程能力的实战平台。作为地方高校转型的重要抓手，产业学院通过深度校企合作实现了资源与需求的无缝对接。一方面，校企共建实体，如河北某工程技术学院与华为公司共同投入资金，建成并共享先进的5G与物联网实验室，夯实了“设备共用、人才共育”的基础。另一方面，共研真实课题，如某智能制造产业学院中，超过80%的毕业设计选题源自企业，其中“食品包装机械自动化改造”等项目可直接应用转化，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 产业化落地：从“校园闭环”到“四链融合”

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是地方高校转型的根本落脚点。成功转型的地方高校，无一不以产业需求为逻辑原点，逆向重构人才培养链条，从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与深度融合。

一是以需求为导向，重构培养方案。一些地方高校通过精准对接市场与岗位需求，反向设计课程与专业体系。例如，温州理工学院通过调研百余家电气企业，精准绘制“低压电器设计”“智能控制系统调试”等岗位能力图谱，并据此开设对应课程。广东某高校则对就业率连续3年低于60%的专业暂停招生，将传统的纺织工程专业改造为纺织新材料与应用方向，使毕业生对口就业率大幅提升。

二是以融合为路径，重塑育人体系。高校通过打破学科界限，构建复合型能力培养模式。例如，某石油设备智能制造学院构建了“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三维融合课程体

系,开设“智能装备创新设计”综合课,融合机械设计、Python 编程、专利挖掘与商业策划。在该课程中,学生改进“自动包装机”需同步完成技术方案、成本分析与市场推广设计。此外,该学院在“创新工坊”中孵化的多个项目已成功获得发明专利并被企业转化,学生成立的初创公司实现了“学习—创新—创业”的有效贯通。

当高校真正实现本土化筑基、工程化架桥与产业化落地,其成功转型的模样便清晰可见:一看“扎根地方”的深度。如盐城工学院围绕沿海产业需求,超 60%毕业生服务本地制造业,成为企业的技术中坚。二看“对接产业”的精度。如湖北某汽车工业学院学生被车企争聘,“上手快、留得住”成为毕业生的良好口碑。三看“服务发展”的力度。如东莞理工学院为松山湖高新区企业解决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技术源”。

以服务区域发展为宗旨的转型之路,生动诠释了地方高校的核心价值所在——它们已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与区域发展血脉相连的创新共同体、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蓄水池和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作者刘德仿系盐城工学院原副校长,宋青系盐城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洪林系盐城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 年 10 月 22 日第 5 版)

服务区域发展 | 人才链对接产业链、创新力激活生产力,湖北文理学院——点燃深度服务城市强引擎 | 杜国锋

阅读提示:在服务区域发展中,如何实现从“参与者”到“驱动者”的角色跃升?这不仅是地方高校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更是其构筑特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当高校真正将服务地方视为战略支点,其发展逻辑便从“资源输入”转向“价值共创”。通过创新体制机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学科布局深度嵌入区域发展,高校的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得以深度融合,最终与城市和区域结成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教育报》2025 年 10 月 22 日“高教周刊”邀请专家学者与高校管理者,共同探寻校地双向赋能、共生共荣的实践方案。

作为湖北省属公办本科高校,湖北文理学院坐落于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阳,长期以来秉持“立足襄阳、扎根襄阳、融入襄阳、服务襄阳”的理念,创新构建了“人才链对接产业链、

创新力激活生产力”的特色发展路径，成为支撑襄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构建人才引育“强磁场”

推进才聚襄阳。学校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联合襄阳市举办“智汇襄阳”“青年学者论坛”等大型人才招聘会，向国内外展示襄阳的发展机遇和学校的平台优势。学校设立人才工作专项基金，实施“致远学者”等人才计划，人才同步享受襄阳市相关政策。近5年，学校共引进博士183人，占襄阳市博士引进总量的40%，其中包括国家级、省级高层次人才30余人，为襄阳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实现共引共享。学校创新实施“共引共享、双岗双聘”模式，联合地方政府和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2023年学校出台《校企双聘博士实施办法》，与在襄企业共同引进、培育、使用人才，建立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机制。学校与东风汽车、骆驼集团等签订人才共享协议，推动人员互派挂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截至目前，学校在编“校企双聘”博士达44人。

打造科技创新“动力源”

协同科技攻关。学校深度参与襄阳市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五大工程”，围绕汽车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组建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推进有组织科研和跨学科协同攻关。近年来，学校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22项、全国行业类奖项20余项，500余名博士教授累计服务企业1500余次，与千余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攻克技术难题1700余项。学校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团队与襄阳华智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科研成果转化协议，总投资3亿元建设产业化基地。

推动产业升级。学校发挥智力资源优势，与企业共建26个省部级科研平台，构建“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协同创新机制，搭建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市场需求有机衔接，设立专项资金助力科研成果转化。如在食品工业领域，学校发酵食品科技创新团队建成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传统发酵食品微生物种质资源库，为行业龙头企业供应菌株。

深耕智库服务“示范田”

深耕文脉沃土。学校成立襄阳历史文化研究院，依托鄂北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研究中心等省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系统开展三国文化、历史名人等专题研究。近年来，承担40余项国家和省级项目，获8项省部级奖励，出版了41部具有襄阳地域

特色的专著，整理出版 7 部襄阳市下辖各县市区明清县志，主持完成襄阳市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

强化智库建设。聚焦汉江生态经济带、襄阳都市圈、等襄阳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学校不断加快科研平台和新型智库建设，打造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 3 年，114 份高质量政策咨询报告获领导签批或部门采纳，其中 6 项成果获国家级领导签批或采纳。智库团队围绕“万里茶道”申遗、传统村落保护等提交咨询报告，助力 9 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谋划校地合作“新篇章”

提升育人品质。学校紧密对接新兴产业，深化产教融合、校地协同、创新创业、开放办学，推进湖北科创学院（隆中）、嘉环现代产业学院、教师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以及综合改革试验区牵头高校、综合改革示范校等省级平台建设，努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以“3445”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为抓手，锚定襄阳高端装备全产业链，与在襄企业共建 35 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5 个省级工作站、1 个省级卓越工程师校企联合培养基地，推动高层次人才在地方实践中成长。

强化地方支持。襄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襄阳市投入 50 余亿元高标准推进学校新校区建设，并设立专项人才资金，对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安家补贴。此外，襄阳市每年安排 2000 万元支持学校创建综合性大学，支持学校围绕地方产业需求优化学科布局，为校地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 年 10 月 22 日第 5 版）

院校研究 | 中国院校研究的三种模式及其特征 | 魏署光 马玉龙

摘要：中国院校研究经过初步形成、规范发展，逐步走向成熟。院校研究主体以数据驱动决策为理念，致力于推动院校研究组织化与制度化发展，先后形成了专题研究式、共同创造式和数字驱动式三种模式。三种院校研究模式在主体构成、内容侧重及组织形式三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院校研究模式的发展特征体现了院校研究主体协作从松散式联结到制度

化联结的跃迁；院校研究价值实现了从高校管理工具到师生成长伙伴转型；数据驱动不仅是其底层逻辑，还重构了决策支持范式。

关键词：院校研究；模式；专题研究式；共同创造式；数字驱动式

中国院校研究历经 20 余年发展，从初步形成到规范发展，正逐步走向成熟。当前，高校管理者和研究者对院校研究形成了较高的认同，对院校研究的价值定位和实践路径达成基本共识，越来越多的高校重视并推进院校研究。院校研究在中国高校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日益增强。当制度化的院校研究实践在不同情境中持续显现共性特征时，便形成可分类、可复制的院校研究模式。院校研究模式是高校根据自身实践形成的一套开展院校研究的范式，是从院校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具有代表性和推广性的实践路径和方法体系。院校研究模式主要由院校研究的主体、内容及组织形式构成。其中，院校研究主体是高校从事院校研究活动的机构与个体行动者的集合，体现为校领导、职能部门行政人员、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师生群体等的不同组合。院校研究内容是指具体的研究主题、分析维度或问题领域，包括战略规划、资源配置、科研管理、学生事务管理、教师人事管理等；凡是决策者关注的议题，都可以成为院校研究的内容。院校研究组织形式指在高校中通过结构化、制度化与功能化手段构建的研究体系，其核心要素涵盖机构设置、资源保障、协作机制及开展过程。

中国院校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对美国院校研究的系统引介。美国院校研究主要包括集中式、分散式和联邦网络式三种模式。[1]其中“集中式”指院校研究活动集中于学校专门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分散式”指将院校研究职能由各业务部门分头执行；“联邦网络式”指校级院校研究办公室负责核心数据分析，各业务部门开展基础数据分析，院校研究办公室主要承担数据整合与协调职能。由于中美院校研究在发展阶段、组织情境与发展路径存在显著差异，美国院校研究模式的分类逻辑难以直接适用于我国。中国院校研究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分散化模式，具体包括专题研究式、共同创造式、数字驱动式三种类型。它们在研究主体构成、内容侧重和组织形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以下将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具体分析。

一、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及其特征

系统收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是院校研究的基本特征。我国开展院校研究之初，鉴于院校研究数据系统建设尚不完善，2007 年全国院校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明确提出，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作为主要方法，推进院校研究。[2]专题研究式

院校研究模式是高校针对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系统化、聚焦化、科学化的专题分析,形成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院校研究的主体范围相对有限,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在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建议下,聚焦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关键问题,通过专题研讨或课题立项等形式,系统开展相关工作。

1.院校研究主体主要由校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和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构成

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的主体由行政人员(包含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和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构成。前者凭借管理权威与资源调配能力,为院校研究提供制度保障与实践场所;后者依托方法论训练与理论素养,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两者的协同效能直接决定院校研究成果的转化效果。具体来讲,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熟悉学校实际运作,能较为准确地提出管理问题,并在人员配置、经费投入、制度激励等方面提供开展专题研究的条件,推动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校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精力有限、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很难保证研究的持续深入,因此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参与是决定专题研究质量的关键。作为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的核心主体,专业人员需立足院校研究的内涵特征,精准确定选题,依托专业素养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撑。具体体现为,第一,围绕学校发展重大问题和部门实践真问题开展研究,为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把关。第二,基于院校研究的价值取向,产出研究报告与决策咨询类成果。第三,通过决策咨询职能定位,向职能部门负责人或校领导报送研究结论,促进成果转化应用。

2.院校研究内容更多聚焦高校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议题

专题具有问题导向性和情境嵌入性。其范畴既涵盖教师教学或学生学习等微观议题,更聚焦高校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议题,如明确办学定位,制定发展战略,凝练办学特色,优化资源配置等,因而始终受到校领导的高度关注。例如,铜仁学院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明确学校的发展方向,由时任校长侯长林牵头设立了“学校办学类型定位研究专题”。经过系统论证,该校确立了“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并结合学校实际与区域需求,科学界定其内涵框架。

专题研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单一部门难以独立完成研究任务,因此需要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通过整合多主体资源,确保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实践指导性。例如,铜仁学院明确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后,组织多部门开展专题研究,具体包括:研究生院开展“教学服务型大学学科建设效益监测与评价体系研究”,科研处开展“教学服务型大学

学术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人事处开展“教学服务型大学教师分类管理体系建设研究”，教育学院开展“教育服务型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等，各部门围绕学校办学类型定位产出了系统研究成果，推动学校实现转型。

3.院校研究多以专题研讨或课题立项的形式开展

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推进：一是松散型专题研讨，二是制度化课题立项。实践中，多数高校立足校本实际，由发展规划处或院校研究所牵头立项课题，并严格实施论证评审、中期检查与结题验收等管理环节，要求课题组成员必须来自职能部门、发展规划部门或院校研究部门，此举既有助于开展专题研讨，又能突出研究工作的实践与应用导向性。例如，北京大学的院校研究由该校教育研究中心统筹管理，南方科技大学的院校研究则由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负责实施。院校研究主体呈现一种超越传统科层制的临时性协作关系，这种关系以专题或研究课题为纽带，将不同主体连接形成研究型协作网络，具有显著的动态特征。

在研究过程中，多主体通过“明确选题—课题立项—开展研究—决策应用”的链条实现协同。第一，明确选题环节。校领导或部门领导以其战略眼光和对学校整体发展的把握，确定具有关键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主题。第二，课题立项环节。院校研究机构大多承担课题管理任务，需组织多元化的评审专家队伍，对选题、设计、团队等关键要素进行把关。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及专业研究人员是项目申报的主力。如北京大学近年立项的院校研究项目中，65%的课题负责人由行政管理人员担任，28%由专任教师担任。[3]第三，开展研究环节。各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能力，协同开展研究。院校专业研究人员作为核心力量，运用科学方法和先进分析工具深入探究专题；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发挥自身在数据收集、资源协调等方面的优势，提供必要的资源、技术设备支持，并协助院校研究人员与校内各部门沟通；师生群体作为研究参与者和实践对象，提供了第一手的实践案例和反馈信息。第四，决策应用环节。校领导对研究成果的重视是推动研究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职能部门依据研究成果制定实施计划及政策文件，将成果转化为行动措施以指导学校工作；院校研究人员提供咨询，确保成果准确有效落地。因此，所有主体聚焦专题研究目标，通过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实现高效协作。当然，随着研究目标的达成和研究专题的结束，这种互动网络可能难以实现制度化运作。

二、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及其特征

随着中国院校研究逐步走向成熟,院校研究得到越来越多高校的认可,院校研究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加快,院校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出现了共同创造式的院校研究模式。〔4〕这一模式是以多主体协同为基础、全员参与为目标的,旨在构建“目标共创—过程共治—成果共享”的治理生态,推动院校研究从传统的“数据分析职能”向“全员参与治理机制”转化。其运行机制的核心在于凝聚校领导、职能部门行政人员、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师生群体等多元主体的共识,围绕共同目标,通过共同创造,实现共同发展。在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实践中,师生群体不仅成为院校研究的重要主体,其发展需求更直接转化为研究议题,由此显著增强了院校研究的制度化水平与治理效能。

1. 院校研究主体中的师生群体参与是实现共同创造的根本前提

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模式的核心价值是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生态系统,实现高校治理效能提升。校领导、职能部门行政人员、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以及师生群体共同构成了该模式的运行基础,且各主体具有明确分工。校领导作为决策层,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承担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的核心职能,通过确立战略目标、构建治理框架,为全员参与提供合法性基础和制度保障。职能部门行政人员作为连接战略与实践的枢纽,与院校研究专业人员共同构成了院校研究协同体。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是院校研究的主导者,凭借自身专业能力,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先进的理论工具,对学校的教育教学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为学校决策提供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报告、咨询建议等。

需要强调的是,师生群体的参与是构成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的根本前提。师生群体以数据提供者、治理参与者及效果验证者的身份,参与院校研究。作为高校管理服务的对象和教育实践的直接参与者,师生的需求、期望及其对学校工作的满意度是院校研究的核心关注点。这些信息通过师生参与的调查问卷、座谈会等渠道获取,集中反映其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校园文化等方面的意见,为学校治理与改革发展提供实践依据。

2. 院校研究内容更多聚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议题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我国高校在生源、经费与办学效益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对办学效益的评价从声誉导向、资源导向转向成果导向;院校研究的关注点从行政性事务转向学术性事务。这与21世纪以来美国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院校研究内容的转向相一致。学术性事务通常包括教师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如何有效发挥高校人才培养与

科学研究的核心职能,成为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关注的焦点。例如,文华学院以“共同目标、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为核心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将促进师生共同成长作为发展目标。在此文化下,师生通过教学研究推动课程改革,如基于毕业生访谈反馈设计个性化教育体系,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通过组织培训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等。最终,通过共同创造行动推动师生发展,进而使个性化教育成为该校的办学特色。

3.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体现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与制度设计

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模式能否成功,关键在于高校领导的理念认同与持续推动。在塑造组织认知过程中,领导者的个体意义建构通常先于组织意义建构,且领导者对组织文化和组织价值观的塑造发挥了关键作用。[5]高校主要领导从三个层面推进院校研究工作:首先,充分认识院校研究对高校发展战略与科学决策的关键支撑作用;其次,将院校研究纳入学校重点工作体系,通过组建专业化院校研究队伍,明确其在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制度性地位;最后,校领导率先垂范开展院校研究,聚焦学校建设中的战略性议题,引领全校共同开展研究。在此过程中,校领导需为全员参与提供资源保障,将院校研究机构打造为学习型组织的核心枢纽,使院校研究机构在决策层、执行层和参与层的联动中,有效发挥战略分析师、决策支持者和赋能者的作用。

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模式有赖于构建多层次联动的矩阵式组织结构。这一结构通过纵向贯通与横向整合的双重机制,为全员参与院校研究提供组织载体。在层级结构中,顶层为战略决策层,通常由校领导牵头,其主要职责是通过顶层设计引领全校开展院校研究,并协调推动其落地实施。中间层是执行层,由院校研究办公室主导,协同职能部门组建横向协作网络,形成目标一致的协同体系。参与层以师生群体为代表。师生群体是共同创造的重要参与者,很多院校研究任务如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均需要师生群体的深度参与。例如,文华学院在设置专门院校研究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院校研究协调委员会,由校长任主任,主要校领导及机构负责人任副主任,核心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与,形成兼顾专业独立和业务多元的“1+X 院校研究协同体”。烟台理工学院通过设立直属机构—院校研究所,依托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构建涵盖核心智囊团队、专项研究团队及个体研究组成的三级研究体系。该机制通过鼓励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参与,有效营造了重视研究、崇尚创新的组织氛围。教职员工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为院校研究的全员参与奠定了文化土壤。这种组织结构与机制的设计,不仅打破了部门间的信息壁垒与组织界限,还实现了多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与价值共创。

三、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及其特征

在数字化转型纵深推进的背景下,高校依托组织协同机制重构决策生态:通过数据智能系统支撑学生个体发展决策,推动个性化教育从理论构建走向规模化实践。在此进程中,以数据为内核、算法为引擎的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模式得以产生。自2023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学术年会持续关注AI时代的院校研究,聚焦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的目标与路径。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决策支持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数字技术重构决策支持生态,而不仅限于传统的数据驱动。需要明确的是,数字驱动(digital-driven)有别于数据驱动(data-driven)。前者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决策支持系统的整体重构,典型应用包括智慧校园建设、跨部门协同平台开发等;后者侧重于通过数据分析优化局部决策,如招生策略调整或课程效果评价。在这一新型研究范式下,院校研究主体正在构建人机共生的智能协同网络,其创新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学生个体决策,二是依托全域全流程的数据治理体系提供系统性保障。

1. 院校研究主体构建人机共生的智能协同网络

在数字驱动型院校研究模式中,院校研究主体仍以校领导、院校研究专业人员、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和师生群体为基本构成,而AI智能体(Agent)作为关键赋能伙伴,其作用不断强化。校领导作为战略决策者,主导信息部门建设校级数字基座,同时建立算法治理委员会,制定数据使用规则并分配决策权限。通过AI智能体的辅助,校领导获取所需数据更为便捷。院校研究专业人员作为决策智库的核心成员,辅助决策者在数据驱动下作出科学决策。他们开展算法社会影响评估(Algorithmic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负责模型训练与偏差修正,突破传统数据工程师的职能边界,担任伦理审查员,从人本主义和社会伦理视角对数字技术进行审视与评估。例如,在审查招生预测、学业预警、资源分配、个性化推荐模型时,需重点检测是否存在性别、种族、地域、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的歧视或偏见。职能部门作为数据生产与验证节点,实时更新业务数据流。师生群体兼具数据主体、模型训练参与者和检验者等多重身份,通过反馈持续优化教育场景下的个性化推荐算法。AI智能体扮演“智能辅助者、协同参与者与持续优化者”的角色。通过实时处理多模态数据,它能够完成从数据到洞察、从信号到行动的转化,支持实时学生咨询与反馈,甚至自动启动干预流程。借助异常监测与路径优化,AI智能体能够基于学生行为数据持续评估决策执行成效,并迭代模型,实现与人类决策的协同配合。随着技术迭代,AI正发展为院校研究的增强辅助者,通过修正决策偏差、优化学习路径,与人类主体形成人机协同机制。这种智能协同网络始终遵循“人为主

导、技术赋能”的根本原则。

2. 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致力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学生个体决策

在数字驱动下,构建全域数据治理体系,能够实现多模态教育数据的深度融合与实时流动。院校研究人员借助数智技术,将AI智能体嵌入数字系统,对课堂教学行为、校园生活轨迹、管理业务流程等数据进行分析,为学生提供咨询和指导。例如,清华大学学生AI成长助手“清小搭”上线了多个伴学智能体,覆盖学业辅导、科研创新、职业规划等校园学习生活方方面面,7×24小时随时响应需求。数字驱动体现为算法模型深度介入教育决策,其核心是从被动分析转向主动预测。院校研究由此突破统计报表局限,通过机器学习、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从“描述现状”向“预判趋势”的跨越。

数字技术不仅赋能高层决策,更重要的是赋能学生个体的微观决策。院校研究的传统职能是为高校领导提供决策支持,重点关注学校转型发展的宏观决策、院系治理的中观决策。其虽然关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但重心在于挖掘学生群体的共性特征。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模式的产生标志着院校研究价值输出范式的转变,其本质是从群体普适走向个体定制。它通过智能体集群(如学业规划智能体、心理健康智能体)生成千人千面的决策支持方案,在课程推荐、就业指导、资源分配等场景提供实时动态服务。教育大模型整合多模态数据,构建学生动态全息画像,突破传统数据驱动的单一维度分析局限。基于此,学生既是个人学习决策的主体,也成为院校研究的服务对象。

3. 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有赖于全域数据治理体系的支撑

院校研究数据治理重点关注两个维度:一是技术层面围绕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活动集合,二是组织制度层面有关数据决策权和职责的分配。[6]通过技术层面和组织制度层面的建设,全域数据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为开展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奠定了基础。全域数据治理是指通过系统化的管理框架和技术手段,对高校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全业务、全流程和全要素的数据资产进行统一管控与价值挖掘。

在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模式中,院校研究主体的互动逻辑和方式紧密围绕数据的全生命周期展开,形成了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分析,再到决策优化的闭环协作流程。在数据采集阶段,信息部门通常承担着基础性的数据汇聚任务,负责从学校业务系统中提取原始数据。例如,同济大学通过构建数据仓库,实现了财务、预算、人事、学生等数据的整合与集成。在智能分析环节,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挖掘数据规律,信息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撑,两者共同提升分

析效率和准确性。武汉理工大学通过将垂直业务数据链进行网状融合,绘制师生群体的立体化画像,实现单一数据点与业务数据链的有机整合,从而构建支撑学校决策的画像数据网络。在决策优化阶段,学校领导基于分析结果制定科学政策,各决策部门执行并反馈,形成闭环管理机制,确保院校研究成果与学校实际需求精准对接,推动管理持续改进和教育质量提升。师生通过 AI 智能体进行个体决策,智能体自主获取执行效果并迭代优化。通过建立数据标准、流程规范和权责清单,实现了数据从生产到应用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全域数据治理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学校层面的组织设计。一方面,基于顶层设计,形成学校领导层、决策咨询机构、业务部门、信息部门以及师生员工的行动共识;另一方面,数据治理需要系统化的制度保障。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建成了智能运行中心,作为正处级单位,该中心实体化运行,14个职能部门进驻,联合办公。由此,该校形成了以智能运行中心为“大脑”,协同信息化办公室、党政办公室、网络信息中心组成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四驾马车”,共同形成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新格局。而同济大学以发展规划部门作为核心牵头单位,协同行政与技术部门推进智能决策系统建设,其数据系统的最高管理权限直接归属院校研究部门。实践表明,组织架构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高校能够将全域数据治理从技术工具升级为战略决策的核心支撑,并依托人机协同机制构建动态治理生态,最终为数字驱动的院校研究提供制度化保障与可持续协同框架。

四、结语

以上阐述了中国院校研究的三种模式,并从主体、内容及组织形式三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 院校研究主体协作经历了从松散式联结到制度化联结的跃迁

中国院校研究发展呈现出从分散化向系统化、制度化发展,从“专题临时团队”到“制度化协同矩阵”再到“人机共生”演进的趋势。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以专题研讨或课题立项为主,主体间形成临时性协作网络;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逐步嵌入高校治理结构,形成制度化的多主体协同机制;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中人机协同成为新常态, AI 智能体以“智能辅助者、协同参与者与持续优化者”的角色,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进一步提升了院校研究主体的工作效能。这种结构化变迁使院校研究日益成为高校治理体系的核心基础设施。未来,高校数字化转型将通过数据驱动和智能技术重构研究流程,推动院校研究组织形态向弹性化发展,构建虚实融合的协同网络。

2. 院校研究价值实现了从高校管理工具到师生成长伙伴的范式重构

传统院校研究主要服务于学校战略规划或宏观管理,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功能则向师生个体层面延伸。通过 AI 智能体,院校研究可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建议,为教师生成教学反馈,实现从“管理类决策支持者”向“个体成长赋能者”转型,这一变化反映了高等教育治理的民主化趋势——师生从被研究对象转变为院校研究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也表明院校研究正在成为链接组织发展与个体成长的中介。未来,院校研究需进一步平衡群体决策与个体服务的关系,实现双向赋能。

3. 数据驱动是院校研究的底层逻辑,但数字驱动重构了决策支持范式

尽管上述三种模式均强调数据的基础性作用,但其技术实现与价值输出存在差异。专题研究式院校研究依赖结构化数据的静态分析,共同创造式院校研究注重多源数据的协作共享,而数字驱动式院校研究通过全域数据治理和 AI 算法实现实时智能决策。数字驱动并非简单替代传统模式,而是通过数据融合、算法介入和服务升级,将高校治理从“经验驱动”推向“循证驱动”。这一转变实质性地提升了决策科学化水平:数据不再仅是辅助工具,而是成为决策生态系统的核心生产要素。院校研究者在数据分析与结论提供的过程中,需特别关注数据伦理,确保技术应用符合教育规律。

参考文献

- [1] SWING R L, ROSS L E. A New Vis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J].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2016, 48(2): 6-13.
- [2] 张俊超. 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推进院校研究——2007年全国院校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J]. 高等教育研究, 2007, 28(9): 34-36.
- [3] 马莉萍. 基于多模态数据与混合方法的院校研究案例[Z]. 深圳: 首届中国院校研究案例专题研讨会, 2024.
- [4] 刘献君, 魏曙光. 院校研究中国化: 问题、理论与实践——刘献君教授专访[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3(1): 74-82.
- [5] 张强, 王晨曦, 卢金钟, 等. 和衷而共济: 意义建构理论的内涵、知识框架与未来展望[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 27(8): 98-108.

[6]董晓辉,郑小斌,彭义平.高校教育大数据治理的框架设计与实施[J].中国电化教育,2019,(8):63-71.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院校研究 | 院校研究中的师生参与及其制度保障 | 雷洪德 惠志丹 王坤

摘要:在院校研究“一核多元”的主体协同系统中,师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师生参与院校研究既能发挥其主体能动性,也是解决治校中师生主体缺位问题的迫切需要,更是顺应高校治理民主化趋势的必然要求。师生通过数据提供、治理共建、效果验证等形式参与院校研究。为从制度上保障师生参与,高校有必要实行院校研究项目制,开展制度性交流,完善激励机制。

关键词:院校研究;师生参与;制度保障

师生是高校中占比最大的群体,也是院校研究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在院校研究“一核多元”的主体协同系统中,师生既是数据的主要生产者,也是高校治理效能的作用终端,理应通过参与高校治理来实现其“研究主体”与“服务对象”双重角色的统一。然而,在现行的院校研究实践中,受多重制度性障碍的制约,师生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1]。这种缺少师生参与的院校研究模式,导致师生的利益诉求和群体智慧难以反映到院校研究中,容易造成决策失真、治理存在盲区、改革阻力加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严重削弱院校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因此,有必要深入认识院校研究中师生参与的重要意义,总结推广已有的实践经验,并以制度建设来为师生参与院校研究提供保障,通过师生参与来推进院校研究走向成熟。[2]

一、院校研究为何需要师生参与

走向成熟的院校研究,不能仅依赖院校研究专业人员,还需要建立多元主体观,鼓励师生积极参与。这不仅有助于发挥师生的主体能动性,也有助于解决治校中师生主体缺位的问题,顺应高校治理的民主化趋势。

1.发挥师生的主体能动性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其中

“协同”一词被提及多达10次。在这个指导未来十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该词高频出现凸显了协同在我国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协同理论所指出的,开放系统中各子系统的协同可以产生“1+1>2”的效应,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越高,开放系统的协同效应也越高。[3]协同理论还发现,组织管理领域存在协同增效现象,多元主体可通过目标对齐、资源共享等方式实现共同目标。[4]

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是高等教育,其发展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诉求多样、关系复杂。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益相关者的协同尤为重要。院校研究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高校领导、院校研究专业人员、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和师生,他们之间是否协同以及协同程度如何,直接决定院校研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提升高校治理效能。在理想的院校研究中,多元主体构成一个如图1所示的协同系统,其中高校领导是引领者,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是核心推动者,职能部门行政人员是重要主体,师生是参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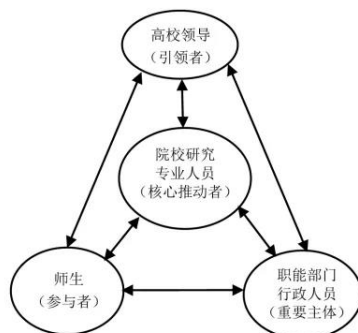


图1 院校研究“一核多元”主体协同系统

遗憾的是,现实的院校研究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仍不完善,师生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尤为不足。以院校发展战略规划为代表的院校研究成果,常常面临“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尴尬境地,其原因之一在于,师生参与程度低,其主体能动性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对院校研究成果的接受度不高。不仅如此,与其他主体相比,师生在现行的院校研究实践中更多处于被研究、被告知的地位。这种现状亟待改变,因为师生参与对院校研究的深度、广度和有效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高等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对高校发展的感知最为直接。他们的意见往往能触及高校治理的核心问题,不仅能为院校研究提供更为丰富、更加多元的视角,而且能增强院校研究成果的可接受性,为其执行提供民意基础。因此,高校有必要发挥师生的主体能动性,引导他们积极参与院校研究。

2.解决治校中师生主体缺位问题

当前,师生主体缺位已成为院校研究走向成熟的严重制约因素。在院校研究实践中,师

生的声音往往被忽视或边缘化,以致他们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有效表达。例如,院校发展战略规划是典型的院校研究,与师生利益密切相关,理应充分尊重和采纳师生的意见。但是,在院校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大多数师生只是浅层的知情参与,只有少数师生可能做到评议参与,能够做到深度决策参与的师生少之又少。这容易导致院校发展战略规划内容脱离实际,难以反映师生的实际需求。长此以往,师生的参与积极性和院校归属感都会受到打击,高校治理的民主化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在院校研究的主题关注方面,师生主体缺位的问题同样明显。截至2025年1月25日,以“院校研究”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进行检索,可以发现538篇学术文献(含504篇期刊论文和34篇学位论文),其文献数量是颇为可观的。但是,在这些文献中进行全文检索,仅有96篇含有“师生主体”、“教师主体”、“学生主体”、“师生参与”、“教师参与”、“学生参与”六个词中的某一个,其文献占比不足18%。如果将上述六个词中的任意一个作为关键词,与“院校研究”这一关键词进行“与”式组配检索,更是连一篇文献都找不到。以上检索数据显示,“师生主体”或“师生参与”作为研究的主题词,虽然偶尔出现在我国院校研究的学术成果中,但远未成为重点内容。进一步看,在战略规划、质量评估等院校研究的重点内容中,研究者往往将师生视为被动的管理对象或服务客体,较少立足于师生主体视角对师生的主体地位、参与机制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更无法为解决师生主体缺位问题提供有效指导。这不仅影响了院校研究的质量和效果,也阻碍了高校治理民主化进程。

3. 顺应高校治理民主化趋势

民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要义在于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必须保障主权在民,由人民当家作主。[5]具体到高校层面,治理民主化指的是师生广泛地、实质性参与学校决策过程。这不仅是汇聚群体智慧、提升治理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对师生正当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回应。

高校治理走向民主化道路,既有制度依据,也符合发展趋势。从制度来看,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98年8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民主管理被确立为高校的基本办学原则之一。2011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其中要求“章程应当明确规定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的地位作用、职责权限、组成与负责人产生规则,以及议事程序等,维护师生员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相关事项的民主决策、实施监督的权利”[6]。上至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下至高校办

学基本准则,无不要求高校发扬民主,保障师生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从发展趋势来看,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经典研究结果显示,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尤其是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校治理不再只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主导,而是需要更广泛的师生参与。[7]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高校治理呈现出特罗所说的发展趋势。大势所趋之下,高校治理需要顺势而为,努力提升民主化水平。

高校民主治理需要院校研究提供支持,而院校研究功能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师生参与。缺乏院校研究支持的高校民主治理,如同盲人摸象,难以全面把握治理脉络;缺乏师生参与的院校研究,则如同无源之水,难以精准回应实际诉求。从治理合法性角度看,组织运行是一个政治过程。只有通过制度化渠道保障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组织内部的冲突与分歧才会得到调解,决策方案才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其执行过程也才更具稳定性与有效性。[8]不过,也有人担心,师生缺乏参与院校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其参与可能降低研究质量和决策效率。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是人才汇聚之地,师生具有群体智慧,可以为院校研究提供量大面广的智力支持。更何况,开展院校研究的直接目标是促进院校发展,但最终目标是促进师生发展,并不必等到师生具备意识和能力之后再吸纳其参与,而应努力激发其参与意愿,提升其参与能力。尽管这在前期需要在动员、组织、培训等方面投入一定成本,但这些成本往往会通过提高效率和减少阻力,在政策执行阶段得到有效补偿。

二、师生如何参与院校研究

从功能发挥看,师生参与院校研究可以划分为数据提供、治理共建和效果验证三种基本形式。这些形式共同构成了师生参与院校研究的完整过程,其中数据提供式参与是基础环节,为院校研究奠定实证基础;治理共建式参与是关键环节,使师生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效果验证式参与是保障环节,确保研究成果有效落地。

1.数据提供式参与:奠定院校研究的实证基础

实证研究是院校研究的基本范式,数据则是院校研究的实证基础。重视实证的院校研究,需要数据支撑,其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师生。他们是高校中占比最大的群体,也是院校教学、科研工作的主体,可为院校研究提供大量第一手数据。虽然不少师生可能没有听说过院校研究,以为自己并没有参与其中。但事实上,在大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院校研究正在大量开发和运用师生在现实情境中自然生成的行为数据。对于这样的院校研究,师生参与常常是行而不知的。除了这种自然参与,师生还常常以知情的、自主的形式参

与院校研究。例如，基于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的教情调查或学情调查，这种形式的院校研究需要获得师生的知情同意，师生可自主选择是否参与其中。

师生通过提供数据来参与院校研究，可以将个体经验汇聚为群体智慧。这种参与的价值不仅在于扩充数据来源，更在于增强数据的真实性和可用性。因为师生是院校生活的直接体验者，他们提供的数据能真实反映院校运行的实际状况。同时，通过数据提供式参与，师生还有可能深入地了解院校研究的流程和方法，提升自身的科研素养。在这方面，西安欧亚学院正在进行的实践探索受到业界关注。该校组织开展学生就读经历调查，从问卷设计阶段开始，就广泛吸收师生参与。在资助设立院校研究专题项目时，该校明确要求每个项目的研究成员至少要有1名教师和1名学生。这不仅让师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运用自己的智慧，还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开展院校研究，更好地为学校的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师生在数据提供式参与中面临着两个障碍。一个障碍是数据的公开性不强，虽然师生以不同方式提供了大量数据，但这些数据大多被搁置在各职能部门和院系的“信息孤岛”中，师生往往接触不到。尽管教育部早在2010年就开始施行高校信息公开办法，并在2014年进一步公布了10大类50条的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然而这个规范性文件的执行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另一个障碍是数据的标准化程度不高，高校各部门和院系的数据采集标准和格式常常不统一，使得师生提供的数据难以整合和挖掘。不同的统计口径和分类方式，导致数据之间缺乏可比性，极大地影响了数据分析和利用的效率。

2.治理共建式参与：增强院校研究的公共价值

在院校研究中，治理共建式参与指的是师生以主体身份深度融入关键环节，对高校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此过程中，师生需要转换角色，从被动接受者转为主动参与者，从数据提供者转为治理共建者。这种角色转换的实现，宏观上有赖于高校治理模式从“他治”走向“共治”，微观上需要院校研究增强公共价值，不仅服务于领导决策，也回应广大师生的利益诉求。

然而，现实中多数高校沿用的是“他治”模式的院校研究流程，往往是领导提出需求，然后由专业人员和行政人员去研究。在此模式下，师生虽然在各种校情报告中被频繁地提及，但多以被调查、被研究的身份，被动地、浅层地参与研究；在议题选择、方案制定、数据解读、成果应用等关键环节，师生常常是缺席的，即使出席也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不仅限制了师生的主体能动性发挥，也使得院校研究难以真正反映师生的实际需求，降低了研究成

果的公共价值。

针对上述问题,高校需要积极促进师生的治理共建式参与,努力增强院校研究的公共价值。一方面,提升院校研究的公共性与回应性,让师生不再只是决策执行的末端角色,而是参与决策的重要主体。这有助于院校研究更精准地回应师生的利益诉求,使研究成果更具公共价值。另一方面,增强师生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当师生的意见受到重视,合理建议被采纳,他们会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到学校建设中,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学校发展贡献力量。此外,治理共建式参与还需要培养师生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使他们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与他人协商合作,如何权衡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这些能力不仅有助于提升院校研究的决策支持水平,对于师生的教学发展和未来生活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3.效果验证式参与:完善院校研究的闭环机制

效果验证式参与是师生参与院校研究的关键反馈环节,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对院校研究成果的实践检验与效果评估,推动形成“研究—应用—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这种参与形式根植于质量管理理论中的“PDCA 循环”(Plan-Do-Check-Act),强调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对其效果进行评估与反馈。师生作为政策执行效果的直接承载者,无疑是具有发言权的评估主体。正如 PDCA 循环所揭示的,只有在“检查”与“行动”阶段,研究成果与政策措施的实际成效才能真正被识别、分析并加以优化。〔9〕因此,师生参与效果验证,不仅是一种民主参与形式,更是推动院校研究从“研究”走向“治理”的关键环节。

在当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中,教师教学体验调查和学生学习体验调查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调查不仅为院校研究提供了真实、动态的反馈数据,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基于实证的决策依据。遗憾的是,师生的效果验证式参与至今还是院校研究的薄弱环节,以致院校研究项目常常出现“虎头蛇尾”或“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例如,有的院校开展教学模式改革研究,虽在前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方案设计得十分完美,但在实践环节却缺乏对师生反馈的及时收集,也缺乏对改革成效的科学评估。项目结束后,改革效果无从判断,既不清楚是否真正提升了教学质量,也无法确认是否满足了师生的实际需求。最终,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没有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安排,也打击了师生参与院校研究的积极性。鉴于此,高校需要积极促进师生的效果验证式参与,切实完善“研究—应用—反馈—优化”的院校研究闭环机制,让研究成果更好地发挥决策支持功能。

三、师生参与院校研究需要哪些制度保障

师生参与院校研究，少数人靠自觉，多数人靠制度。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师生参与院校研究就难以摆脱随意性和偶然性，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只有制度保障到位，师生才能有序且有效地参与院校研究。

1. 实行院校研究项目制，为师生提供正式参与渠道

项目制是相对于常规制而言的，一般是在财政体制的常规分配渠道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以专项资金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形式，项目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益盛行于我国，并溢出财政领域成为国家治理和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机制。[10]具体到院校研究领域，在常规制的资源安排尚有难度的情况下，项目制是一个可行的制度安排。通过项目制，院校研究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支持，确保研究项目能够顺利开展。而且，项目制以课题为导向，有助于聚焦院校研究问题，吸引师生参与研究。

为有效实施院校研究项目制，高校有必要优先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明确责任归属与运行机制。由学校职能部门、院校研究办公室或专门机构牵头负责，统筹项目申报、评审、过程管理与成果转化。同时，设立由校内管理者、专业研究人员、师生代表共同组成的项目委员会，增强治理结构的合法性与透明度。其次，针对师生群体的能力差异与需求层次，科学设计项目类型(如战略规划类、教学改进类等)，确保各类群体均可根据兴趣与能力自主选择参与。此外，还需强化项目的过程管理，提供方法培训与资源保障，确保项目高质量推进。

在实践层面，部分高校的院校研究项目制已初见成效。例如，北京大学自 2012 年起开始设立“北大研究”项目，目的在于通过课题立项的形式，激励全校师生开展聚焦本校改革与发展的学术研究。截至 2024 年，该项目已累计资助 224 项课题，吸引 20 多个院系和 40 多个职能部门的师生参与院校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为北大管理决策提供了丰富、坚实且有科学依据的支持，在校内外得到积极肯定与广泛赞誉。除此以外，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黄河科技学院从 2018 年开始推进产教融合课程体系改革，将课程建设视作院校研究项目来实施，资助教师以院校研究的方式开展项目式课程建设，其建设成果受到省内外高校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2. 开展制度性交流，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并达成共识

除了项目制外，高校还有必要建立制度性交流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制定并执行一系列

的规章制度,对交流的原则、方式与程序提出明确要求,以制度来保证交流的持续性,以交流来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商对话。[11]相较于临时的、偶发的访谈或咨询,制度性交流更强调交流的规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通过制度性交流,多元主体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壁垒,在深入沟通中减少误解和冲突,进而达成共识。在此过程中,师生可以有保障地参与院校研究的关键环节,例如,在议题征集阶段反映现实问题,在数据收集阶段提供资料,在方案制定阶段提出建议,在决策执行阶段监督实施效果等。这不仅有助于师生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也有助于院校研究更好地结合实际情况,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可接受性。

为保障制度性交流机制的有效实施,高校可以着力推进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如专题讨论会、主题沙龙和工作坊,明确交流的时间安排、讨论主题以及反馈流程,确保交流活动可持续开展。其二,将交流活动融入院校研究的正式流程中,确保师生在关键环节拥有制度化的表达机会。其三,完善成果沟通与反馈体系,通过简报、研究报告、校园新闻等多种渠道,将研究成果及时反馈给师生,构建师生参与的完整闭环。以上工作在文华学院得到了积极开展,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性交流机制。例如,每年对150名应届毕业生和40名教师进行专题访谈,系统收集他们对学校发展的意见;通过“周日晚点评”、“寝室小讲堂”等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收集来自教学一线和学习现场的真实反馈;在暑期研讨会等重大决策场合,为师生代表设立专门席位,并将他们提出的合理建议纳入改革方案。通过以上制度性交流机制,师生以治理共建的方式参与院校研究,显著提升了学校治理效能。[12]

3.完善激励机制,增强师生参与动力

激励机制是对项目制和制度性交流机制的正向反馈,其作用是激发参与者的积极性,推动形成良性循环。当前,尽管师生参与院校研究的能力尚有不足,但更大的挑战在于参与动力的缺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激励机制不健全,导致师生缺乏参与院校研究的积极性。一个典型表现是“参与冷漠”,如果院校研究议题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师生往往不愿投入时间与精力参与其中。此外,也有部分师生将参与院校研究视为额外负担,认为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或学业提升没有直接帮助,因而缺乏参与动力。另一个典型表现是“参与疲劳”,有此表现的师生大多数曾参与院校研究,但当发现自身投入未在研究结果中得到有效体现时,逐渐失去热情,并对院校研究产生疏离感。

针对上述师生参与院校研究动力不足的问题,高校需要完善激励机制。对教师而言,高

校可将其参与院校研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在职称评定、岗位晋升、评优评先等方面,对积极参与院校研究且作出贡献的教师给予倾斜。对学生而言,高校可将其参与院校研究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内容,在奖学金评定、保研、评优等方面给予加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高校对他们参与院校研究的最大激励可能来自成果认可,即在研究成果或政策措施中引用或采纳师生的意见建议。[13]具体到实践,有些高校正积极探索以上激励机制的完善路径。例如,烟台理工学院在2021年成立了院校研究所,由校长兼任所长,构建多元课题体系,推动师生全面参与,并将院校研究课题与职称评定挂钩,激励非教学人员结合岗位工作实际开展院校研究。苏州工学院在校内设立院校研究贡献奖,对优秀的院校研究者给予荣誉表彰。这些高校的实践探索表明,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能够有效激发师生的参与热情,推动院校研究走向常态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师生参与院校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种参与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研究成本上升。其次,师生群体规模庞大,在参与过程中可能出现从众心理、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影响研究质量。再次,师生群体内部存在高度异质性,不同群体之间在价值观、认知水平与利益诉求上存在差异,在差异中达成共识需要付出协商成本,达不成共识则会影响决策执行。因此,不能将院校研究中的师生参与视为不证自明的合理行为,而是要权衡研究质量要求与师生可接受性之间的制约关系,合理界定师生参与的范围、层级与形式[14],从而实现师生的有效参与。

参考文献

- [1]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223-225.
- [2]刘献君,陈敏,张俊超.中国院校研究走向成熟的条件、标志及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9):32-39.
- [3]赫尔曼·哈肯.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凌复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11.
- [4]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齐若兰,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122-138.
- [5]俞可平.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J].山东人大工作,2014,(2):61.
-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1111/t20111128_170440.html.

- [7]TROW M.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R]. Paris:Conference on Future Structures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1973:12-13.
- [8]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89-304.
- [9]李贞刚,王红,陈强.基于 PDCA 模式的质量保障体系构建[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34(2):32-40,104.
- [10]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15,(2):82-102,5.
- [11]刘献君.新时代院校研究的规范发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9,(1):93-98.
- [12]刘献君.个性化教育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1-13.
- [13]周川.院校研究与院校管理[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126-129.
- [14]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1-48.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人工智能 | 当知识触手可及：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不可替代的育人价值 | 阿尔西娅·尼德·卡明斯基

阅读提示：10月30日，学习科学家（The Learning Scientists）官网刊发阿尔西娅·尼德·卡明斯基（Althea Need Kaminske）博士文章，文章探讨了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AI）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它对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作者通过个人经历等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强调教师在学习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呼吁重视教育的社会和情感维度，而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以下是文章要点。

作者阿尔西娅·尼德·卡明斯基（Althea Need Kaminske）通过个人经历与学术观察，深刻反思了在人工智能（AI）技术席卷教育领域的背景下，教师角色的根本价值。文章开篇以作者童年时与父亲探索谷歌（Google）的兴奋体验为引，对比当下面对大学盲目推崇AI、削减人文项目的忧虑，引出《福布斯（Forbes）》杂志文章提出的尖锐问题：“当知识免费时，教授何为？”作者指出，公共图书馆早已实现知识的免费获取，但并未取代教育；同理，若将教学简化为“信息传递”，则不仅误解了学习的本质，更忽视了教师的核心作用。

作者批判了试图用 AI 完全替代教师的极端案例，如《连线（WIRED）》杂志报道的阿尔法学校（Alpha School）。该校依赖算法驱动学习，导致学生为达成绩效目标而出现心理困扰，甚至采取自我惩罚行为。这一实例揭示，纯粹以效率和奖励为导向的学习模式无法替代人性化的教育关怀。在此基础上，作者原计划探讨的“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与“专家思维”（Expert Thinking）等概念进一步阐明：真正的学习远非信息的堆砌。专家与新手的区别不仅在于知识量，更在于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专家能构建更丰富的知识网络，灵活应对复杂问题。例如，医学专家费尔托维奇（Feltovich）与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表明，专家医师具备更强的诊断联想能力。

教师的作用正是引导学习者发展“元认知意识（Metacognitive Awareness）”，提供个性化反馈，并根据学生的年龄、能力与背景调整教学策略。学习不仅是认知过程，更是社会性实践。它依赖于师生间的情感联结、学习共同体的支持以及对求知过程的共同庆祝。正如电影《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中主角威尔·亨廷（Will Hunting）虽拥有天才般的自学能力，却仍需导师肖恩（Sean）的心理疏导与社群支持才能实现成长。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知识转移，而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情感成熟度与社会责任感。

最终，作者强调，在技术日益渗透教育的今天，教师的价值在于其“转化性”（Transformative）而非“交易性”（Transactive）的育人本质。他们视学生为完整的个体，尊重其梦想、幽默感与独特性，这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模拟的人性互动。面对所谓的“后信息时代”，作者寄望于下一代仍能遇见真正优秀的教师，守护学习中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与社群温暖。

（来源：学习科学家（The Learning Scientists）官网）

人工智能 | 摘除“人工智能耻辱”的标签：论强制性 AI 披露声明的负面影响与教学转向 | 朱莉·麦考恩

阅读提示：10月28日，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刊发文章，讨论了在高等教育中要求学生披露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声明是否有效。作者曾要求学生在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时提交披露声明，但后来发现这种做法并未达到促进透明和开放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对人工智能使用的羞耻感和不信任。作者主张通过调整评估方法和课堂策略，正常化人工智能的使用，并倡导培养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和伦理意识。以下是文章要点。

在高等教育界当前普遍倡导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AI）的背景下，作者朱莉·麦科恩（Julie McCown）却提出了反对强制要求学生提交人工智能使用披露声明的主张。作者曾是其所在大学写作课程中积极拥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早期采纳者，最初坚信透明度与开放性是关键，因此要求学生必须在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业时进行说明。然而，基于实际观察与反思，她改变了这一做法。

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制性披露声明在实践中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在允许甚至鼓励学生使用人工智能的课堂上，许多学生在提交明显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的作业时，依然不愿提供所要求的披露声明。这并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因为此类声明在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对人工智能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文化氛围中，已然异化为一种类似“忏悔”或“认罪”的行为。学生们感受到的是笼罩在人工智能使用上的羞耻感与污名化，使得诚实的披露反而可能为他们招致带有负面评判意味的标记。这不仅未能促进透明与诚实，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隐蔽性，并将教学互动推向更多的监视与猜疑。

研究证据支持了这一担忧。一项于五月发表的研究表明，在任何情境下（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制），披露人工智能的使用都会导致他人对该使用者信任度的降低。这种效应主要源于“披露”这一行为本身，而非仅仅是因为使用了人工智能。另一篇文章则指出了强制披露政策中诚实与公平之间的内在矛盾：如果缺乏基本的信任与尊重作为基础，人们便不会感到安全去坦承其人工智能的使用。若因此类发现而全面禁止人工智能，不仅不切实际，反而会将学生的人工智能应用彻底驱入地下，阻碍培养未来雇主日益期待的人工智能素养能力的发展。

强制性披露声明非但无助于激发学生对学习过程的真实反思，反而沦为了一种流于表面的“美德信号”，抑制了师生之间本应进行的坦诚对话。更重要的是，它对于遏制劣质人工智能论文的核心问题——如空洞呆板的语气、冗余的填充性语言以及最严重的捏造来源和引文——几乎毫无作用。

鉴于此，作者主张从根本转变视角并革新评估方法。我们应摒弃将人工智能辅助视为需要特殊监控的例外情况的做法，转而接纳并将其视为学生教育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常态要素。这意味着教学的重心应从追问“你是否使用了人工智能？”转向审视“这份作品为何不符合优秀写作标准？”以及“它为何未能达到作业要求？”。无论内容是源自人类还是人工智能，伪造来源都应被明确指出且绝不容忍。

为实现这一转型，关键在于构建能够有效激励深度学习、同时自然消解低水平滥用人工智能的教学设计与评价体系。这包括包括向学生明确阐述在不同教学环节中如何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及其潜在局限，例如借鉴刘丹尼（Danny Liu）提出的“菜单”（Menus）模型。此外，教师自身应以身作则，与学生分享自己在工作中运用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此共同探索这一新工具。具体的课堂实践可以包括引入关于人工智能使用与反思的低风险日志作业，或者鼓励学生面向全班展示其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发现的有趣、奇特或有用的成果乃至失败尝试。

总之，构建真正重视透明与诚实的学习环境，其先决条件是营造安全与信任的氛围。教育者不应再执着于索取强制的“供词”，而应向学生们发出真诚的邀请，欢迎他们加入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人工智能时代，共同分享在适应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经验和专业知识。

（来源：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

人工智能 | 当人工智能成为课堂伙伴：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阅读与思维教育 | 约翰·麦克沃特

阅读提示：10月23日，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官网刊发文章，探讨了年轻人阅读习惯的变化。作者指出，虽然青少年阅读量减少且依赖人工智能完成作业，但这并不令人担忧。麦克沃特认为，信息获取方式在演变，学生仍会选择他们热爱的作品。人工智能的崛起使传统论文写作不再必要，教师应鼓励课堂讨论。通过人工智能辅助，学生可以更有效地表达思想，拥有更多时间进行独立思考，从而拓宽视野与思维能力。以下是文章要点。

在技术迅速重塑生活方式的今天，年轻一代的阅读习惯正经历深刻变迁。语言学家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指出：青少年阅读纸质书的时间显著减少，转而沉浸于短视频与社交媒体；同时，人工智能工具已渗透至学术写作领域，学生开始依赖人工智能完成论文等传统课业。面对这一趋势，许多教育者感到忧虑，认为这将导致集体思维能力的退化。然而麦克沃特提出，我们无需对此过度恐慌，而应理性审视技术变革背后的教育本质转型。

历史数据显示，青少年娱乐性阅读量呈断崖式下跌——1976年约40%的高中生每年自愿阅读6本以上书籍，仅11.5%的学生表示未读过任何书；而2022年这一比例基本反转。

但麦克沃特以自身家庭为例证：他的女儿们虽不再如父辈般终日捧读《安娜·卡列尼娜》，却会对塔赫雷·马菲（Tahereh Mafi）的《破碎的我（Shatter Me）》系列等当代作品产生强烈共鸣。这种选择性精读取代泛读的现象，实则反映了信息过载时代的内容筛选本能。相较于过去被迫接受平庸读物（如作者自述曾忍耐的低质书籍），当下年轻人能更精准地接触激发思考的优质内容。

针对“影像文化侵蚀文字想象力”的批评，作者通过媒介发展史予以反驳。正如戏剧从未因提供具象化表演而遭受贬斥，电视也未曾真正被广播取代，新兴的播客与订阅号恰恰催生了深度讨论的新形态。其女儿们从网络视频中吸收的幽默表达与风格化语言，反而锻造出超越同龄时期父亲的机辩能力。这说明评判文化载体的价值不应固守单一标准，而需关注内容本身的创造性。

关于人工智能对学术训练的冲击，麦克沃特揭示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固有缺陷。回忆大学时光，他坦言多数师生早已陷入“过量布置-碎片讨论”的恶性循环，自己作为教授也曾要求学生研读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晦涩篇章却未加讲解。当人工智能能完美撰写关于《傲慢与偏见》反讽手法或亚里士多德美德观的程式化论文时，继续坚持此类作业无异于拒绝使用计算器的分数练习。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重构考核方式：采用闭卷考试、设计涉及个人洞见的开放式命题（如“如何推动社会接纳初看丑陋的艺术”），以及强化课堂互动评价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全盘否定传统技能的价值。他承认语法规则的社会功能，但犀利指出其中大量规范实为语言学家亨利·福勒（Henry Fowler）等人建构的时尚准则。当人工智能能够高效处理这些程式化要求时，人类便能将更多精力投入核心思维训练——正如现代农业解放了食物种植需求，智能工具也将释放学生的创造潜能。

最终结论指向教育哲学的范式转换：在人工智能承担机械性工作的新时代，教师应当引导学生从枯燥的格式作文转向培养批判性思维与个性化表达。正如麦克沃特总结的，重点不在于执着于工具更迭带来的失落，而是把握机遇重塑教育本质——让学生从繁文缛节中解脱，真正拥有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

（来源：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官网）

他山之石

美国顶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启示—— 基于 5 所大学 PPE 专业的案例分析 | 荀渊 廖思敏 陈璇木子

摘要：在美国本土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潮的影响下，美国顶尖高校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PE）专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专业，试图在延续自由教育理念和适应现代实用性知识之间达至平衡。美国 5 所顶尖大学的 PPE 跨学科人才培养实践，具有传统理智知识教育现代化转向的培养目标，跨越学科边界实现整全意识培养的课程教学，与现实世界相互联系的实践导向以及提倡对学生主体能力多维拓展的评价方式。不仅为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焕生机、迈向跨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方案，而且有望在面对科学和人文分裂的历史论争中，为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做出努力。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高校应超越学科的简单叠加，以知识整合的方式重建跨学科课程；摆脱指标陷阱，构建适切于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的人才评价方式。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人才培养；PPE；新文科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25 年第 9 期）

美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解构及启示——基于普渡大学的范例考察 | 杨冬 游昶

摘要：面向大科学时代，跨学科培养已成为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要义。美国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及其经验主要体现为：在理念目标上，坚持学术创新和实践应用导向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和具备全球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和未来领导者；在组织机制上，突出开放联动、项目驱动与集成创新的产学研用协同共创建制；在课程体系上，指向“核心—深度—广度”三维结构“一体融通”的纵横衔接式模块设计；在研学方式上，实行多元灵活准入、多师联合指导与知行合一范式；在质量保障上，融合师资建设、学生发展和研究支持的立体化全过程资源服务供给。我国大学应重塑理念，遵循国家战略和未来需求精准定位跨学科人才目标；再造组织，创建扁平化、集群化和协同化的跨学科培养机制；课程提质，打造问题导向、注重实践和学科交叉的进阶式结构体系；创新方式，构建集多类型、导师组和

项目化于一体的跨学科研学形态；强化保障，配套专门化、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跨学科支撑和发展体系，进而自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研究生培养体系，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美国；普渡大学；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25年第9期）

国外跨学科培养博士生的要素识别与模式构建——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视角 | 杨秀芹 常玲玲 徐叶莹

摘要：跨学科培养博士生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推动与高校自我革新内生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博士生跨学科培养并在多元制度逻辑交互影响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特征，既体现了传统科研师徒制模式与结构化模式交互融合的结果，也体现了政府逻辑和实践逻辑逐渐向学术逻辑的渗透。基于师徒制的结构化培养模式以欧洲为代表，培养要素“向外兼顾”实现跨学科性，是强调学术逻辑的内生型培养模式；学位项目主导的结构化培养模式以美国为代表，通过学位项目实现跨学科的“系统融合”，是实践逻辑与学术逻辑融合的培养模式；政府主导的结构化培养模式以日本为代表，培养要素趋向“跨域融合”，是政府逻辑占优的外生型培养模式。以此为鉴，我国培养博士生应在明确跨学科目标和理念的前提下，从组织建制、研究项目与课程体系建设、导师联合指导等方面有效平衡学术逻辑、实践逻辑与政府逻辑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以探索跨学科培养博士生的中国经验。

关键词：跨学科培养；结构化培养模式；多元制度逻辑；学位项目；博士生

（来源：《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年第7期）

从科研成果到社会影响：英国 REF 的多维表现与实践启示 | 金童童 刘传斌 毕乐 韩红桂

摘要：科研评价体系由传统的量化评价模式逐步转向注重质量、贡献和社会影响的多元化模式。本文以英国“科研卓越框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6000余份影响案例的表现维度，研究发现：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具有多维度的表现途径，在不同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分化态

势；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在时间维度上展现出显著的学科差异与复杂的影响机制，反映了科研成果与社会系统互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科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产生显著体现了学科交叉性和普遍性特征，深刻揭示了科研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为此，建议研制综合性的社会影响力规范化指南，构建以成本考量为基础的社会影响力评价模式选择机制，制定分层次、差异化的社会影响力评价标准，进而完善科研评价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关键词：社会影响力；科研卓越框架；科研评估；多维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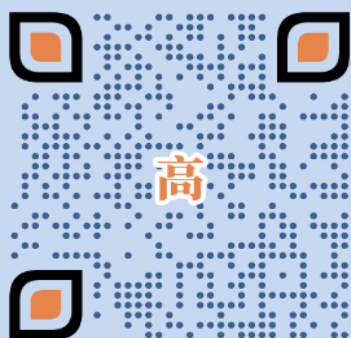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

香港地区大学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及未来构想——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视角 | 全守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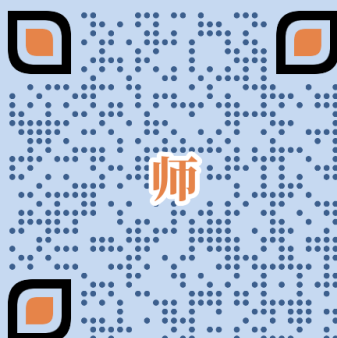
摘要：香港地区大学治理如何从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实现与内地教育融合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现实与理论问题。香港地区大学治理模式移植了英国大学治理模式，在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内部治理结构上仿效英国，形成了路径依赖。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地区大学主要沿用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传统的大学治理模式，其大学治理模式的制度惯性未根本转变；香港特区政府在大学治理过程中未实现充分参与及介入；香港市民文化心理中的实用主义、过于注重追求个人财富给香港地区大学治理造成了深层次的文化影响。要破解香港地区大学治理的路径依赖，应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强问责，香港地区院校重嵌入”为思路，建立起混合治理模式，识别大学治理参与者的性质与特征、明确大学治理目标的双重性、完善治理模式的结构、改进大学治理技术。

关键词：区域高等教育；粤港澳大湾区；大学治理；大学治理模式；混合治理；复合行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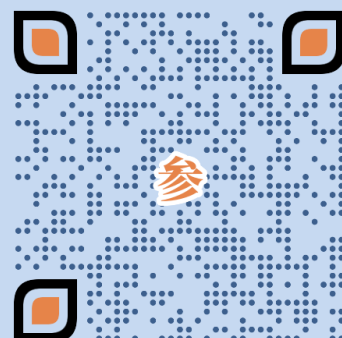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25年网络首发）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年第 24 期
第 2 卷第 24 期·总第 35 期
2025 年 11 月 7 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 100 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 2 楼
<https://ghc.shnu.edu.cn>